**2015-2016中国经济年会**

**主题:引领经济新常态,决胜“十三五”**

地点:北京饭店国际会展中心

时间:2015年12月26日

**开幕式：**

主持人：魏礼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尊敬的曾培炎原副总理，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同志们，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前来参加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2015年中国经济年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顺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目标要求、基本理念、重大举措，对“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决策部署。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会议。会议在总结2015年经济工作的基础上，对2016年经济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同时还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作出了战略部署。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16年是“十三五”时期的开局之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对于做好明年乃至“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工作，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至关重要。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本次中国经济年会的主题确定为：引领新常态、决胜“十三五”。这个主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具有很强的引领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次年会包括一个主论坛、一个专题论坛和两个平行论坛，与会嘉宾将为大家带来精彩纷呈的思想盛宴。下面，首先有请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同志发表致辞

**致辞：**

曾培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曾培炎:

大家早晨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这次中国经济年会的主题是引领新常态、决胜“十三五”。今年是“十二五”收官，明年初就要开始“十三五”的规划实施年，开局之年，也是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发展的新理念下，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今天请大家积极参加讨论，建言献策、汇集智慧、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要把脉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大势，一同来描绘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新的蓝图。我想大家的讨论会有很多的启发，也会提出很多好的建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7年了，全球的经济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危机的阴影，产出能力过剩，自由贸易的进程放缓，全要素生产率下滑。这些问题使得全球的复苏缓慢艰难，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任重而道远。发达国家处于危机以来的较好的状况，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六个度高于2%，但是复苏的势头还不是太稳步。日本和欧盟实现了较低的增长速度，但是增长基础脆弱。新兴经济体集体放缓，中国和印度总体来讲比较稳定，俄罗斯和巴西已经处于衰退的边缘。

展望明年，全球的经济可能呈现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低投资、高债务的“四低一高”的态势。经济复苏的势头仍然偏弱。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最近的国际油价一跌再跌，跌到了40美元以下，创了7年新低，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最近终于落地，从量化宽松周期转向了升息的周期，但是我想升息的周期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可能是一个很缓慢的进程。但是输入性通缩的风险会加剧，以美元计价的海外债务风险暴露，新兴经济体结构的脆弱性也将进一步凸显。

我想问题不少，困顿、矛盾与风险并非对世界经济全景式的勾勒，世界经济的体系中也孕育着一些新的发展势能。比如像互联网、新能源、大数据、共享经济这些多点的突破以及它的融合将推动改变我们发展的模式，让创新从摆脱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作为政策的一种选项，现在已经升级为新的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战略选项，这个趋势值得期待。

当前世界整个经济正处于格局、秩序、规则大变动、大调整的阶段，同样身处在其中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开放大国和负责任的大国，也正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变化。我认为仅仅用转型来概括今日中国的变革已经不够了，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具有了发展的、全局性的特征，它不仅仅表现在增长速度的变化，也包括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经济结构的优化，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政府行政行为的变化，国民福利共享等等丰富内涵和特征。展望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比“十二五”会更加复杂，任务会更加艰巨，挑战会更加严峻。

在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换过程中，不能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必须探索经济管理新的路径。特别是要树立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针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问题，要衔接好供给侧和需求侧，要守住底线思维，准确地识别、预判、化解风险，创新完善政策工具箱，使经济的发展趋稳和蓄势。为此，我提几个问题和大家共同思考和讨论。

一、如何调整经济考核的指挥棒。新常态需要有新的宏观调控的框架和新的指标体系，突破经济增长增速目标的硬约束，改变经济刺激路径的依赖，必须摆脱换档的焦虑。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宏观资源配置效率上来。所以未来可以考虑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到关键性的参考指标，建立GDP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并重的双目标的体系。跨越全要素生产率下滑的陷阱，充分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破解经济、资源、发展三角的困局。

二、要研究建立一个有效的需求与有效的供给相平衡的调控模式。“十三五”应该把握好总量与结构，需求与供给，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多重平衡。实践表明，总量调控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要扭转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板的失衡，必须在总量需求与总量供给平衡的基础上加大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间的平衡。要着眼长远，将年度的宏观调控目标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中，促进短期的宏观调控与长期规划之间的有效衔接。统筹约束目标的年度分解工作，在做好总量调控的基础上，要加强结构调控、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预期调控，推进宏观调控的科学化和有效性。

三、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和环境。因为宏观经济管理大多偏重于产出端，而忽略了投入端。我认为强调经济运行的投入产出比，提高要素的投入综合效率尤为重要。一方面，要选准补短板的突破口，实施企业设备的升级改造，加大提高技术工艺水平，加快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的进程。增加优质价廉产品的供给，满足高质量，差别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新一轮的市场化要素改革，这将促使有效降低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物流的中间环节，应当通过基础设施连通与共享经济的发展，加速各类生产要素跨地域、跨部门的自由流动，善于运用全球的低成本、高质量的要素。要健全要素收入的合理分配机制，控制生产、流通、交易成本的过快上升。

四、要全面加强对创新和软新基础设施的投入。“十三五”最重要的是要把创新真正置于发展全局的一个核心位置，实施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新常态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高效的、有助于潜在增长的投资，从人均资本存量看中国目前只有美国的1/5，未来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需要转变的是原来主要是集中于硬件、基础设施方面的硬投入，应该拨出较大比例投向于创新研发、人力资本，重大的基础创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产品这些方面的软的投入。全面蓄势启动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

五、主动获取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收益。当前中国已经从区域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大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人民币加入SDR，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多边规则的重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等等这些重大的战略举措，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更深度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体系之中。中国连续多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了30%。现在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内的宏观调控、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将会对全球和地区产生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未来的中国需要在规则制定和政策沟通以及全球治理这些方面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的收益。我们在国际合作中不仅要支持国际的发展，也要通过这种发展的过程，我们有合理的收益。当然，我们在参与这些活动中，我们的改革，也包括我们的人民币走出去等等，要避免服务外部性，在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同时，要为维护全球的经济稳定。与此同时也要获取我们外部性的红利作出更大努力。

改革开放攸关中国未来，结构调整路漫漫而修远。希望大家围绕本届年会的主题，碰撞智慧，提出真知灼见。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主题演讲：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分析**

魏礼群:

感谢培炎理事长的精彩致辞，培炎理事长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提出了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丰富内涵和重要推动，特别是强调要运用新思维、新办法，走出新路子。我想，培炎理事长的致辞对于我们今天的年会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让我们再次对培炎理事长的精彩致辞表示感谢。

下面进入主题演讲阶段，首先有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同志。杨伟民同志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重要起草者，他对中央的决策部署有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他今天演讲的主题是：解读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杨伟民（中财办副主任）：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尊敬的曾培炎理事长、各位老领导、各位朋友、各位理事，大家上午好。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不仅对明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其实每次都是一样的，但更重要的是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做了重点部署。会议的主题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供给侧改革的思想，从形势的判断，问题的诊断，工作的思路，重点任务，改革举措，重大原则，提出了一套逻辑严谨、系统完整、方向明确、操作性很强的一揽子的方案。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作出的又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不仅对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对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世界经济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去贯彻执行。

下面我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做什么四方面简单谈谈学习体会。

一、为什么。去年总书记讲过，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逻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了，当然经济工作的思路也要有一个新常态。对新常态到底怎么看、怎么办，这次讲到了要做到三个必须：一是必须统一思想、深化认识。新常态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一种必然决定的大趋势。也就是我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规律，一个阶段，就是要统一思想。二是要克服困难，闯过关口。虽然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也确实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这些困难和挑战是绕不过去的，是必须要闯过去的。三是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克服这些困难，闯过关口，就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的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的安排，就是结构性改革。

新常态下怎么干，如何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做到多个方面的工作重点的转变，主要是讲了十个更加注重。每一个更加注重都是坚持问题导向和原因导向所提出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比如说第二个更加注重讲到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增长下行压力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工业品价格下跌，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下滑，房地产高库存，各类风险增多等等，这些都是病症，但是病根在什么地方，经济工作会议最后的诊断是在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我觉得供给侧的矛盾是经济下行这些病症，已经不是周期性的下行了，已经主要不是总需求的问题了，病根主要在供给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仅靠扩大需求，不改善供给的话，从长期来看，很难阻止经济的下行，特别是企业效益的下滑。所谓结构性矛盾就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存在大量无效供给，而有效供给是不足的，存在不少短板。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无效供给占用着有效供给的资源。比如说新增贷款当中相当部分用于借新还旧、用于偿还利息，投向中期回报率不高的一些项目，流向了虚拟经济，这样间接抬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还带来了经济的金融化、泡沫化、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失衡等等这些结构性问题。所谓体制性的矛盾，就是说供给侧和结构性的这些问题根本原因是市场没能够很好的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资源的优化配置存在体制性、机制性的障碍。比如说在现行体制下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很难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实现市场化的出清，地方政府、银行都不愿意，各有各的小道理，结果小道理淹没了大的道理，这是为什么？

二、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对象和政策手段三个方面：

政策目标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得很清楚，就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政策的最终目标。

政策对象，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要素配置扭曲：一是企业内部要素的配置及其组合，这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精神，靠企业科学管理来实现。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包干就改变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组合方式，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产出就提高了，这是最微观层面的。二是企业间要素配置的结构，就是说资源要更多的配置到优质企业，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全社会的效率才会提高。上世纪90年代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战略性结构调整解决的其实就是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现在说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实际还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三是产业间要素配置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让资源更多的流向有需求、有前途、效益高的产业和经济形态，比如说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工业流向服务业，从传统产业流向新兴产业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其实就是最大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实践。

政策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手段和扩大需求的政策有所不同，主要不再是扩大投资、扩大财政支出、扩大货币的发行，结构性改革的手段主要是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激励创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减少政府不正当干预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就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简政放权，降低电力的价格需要改革电力体制，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就要改革财税体制和养老保险体制等等。

三、怎么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就是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一是宏观政策稳才能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经济运行是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基础，所以经济运行仍然要保持在合理的区间。为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是不变的，但重点和力度明年可能会有所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阶段性的提高财政赤字率，但是增加的赤字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降税带来的财政的减收，这和过去不太一样。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总需求适度增长，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一个宏观基础。所以说，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不是对立的，不是非此即彼，实行供给侧结构改革并不是说要否定扩大内需。

二是产业政策要准才能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所以产业政策要准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也不是说要回到过去的那种产业政策，不是政府要替代企业决策和选择产业，主要是指明大的结构性的方向，比如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存量和增量的关系，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住房制度当中购房和租房的关系等等，具体的投资机会还是要由企业家和各类投资者在市场当中去选择。国家的产业政策主要是从政府指定什么样的产业转向功能性，为企业在市场中发现新的增长点来创造一个好的政策环境。

三是微观政策要活才能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的潜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是作用于微观，而不是作用于宏观。对企业也就是生产者，政府要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权益。这样才能改善企业的市场预期，企业才有信心。对消费者而言，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各种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使有效供给能够顺畅的到达消费者手中。

四是改革政策实才能推动各项改革落地，我们已经推出了不少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下一步必须在实字上下功夫。一方面，改革方案本身要实，符合实际，直接落实，不要层层制定实施方案，以文件来落实方案。当然这也要根据具体改革方面的情况，不同领域有改革的不同情况，主要是减少层层去制定方案的办法。另一方面，方案落地要实，破除顶层设计与实际落地之间的梗阻，使改革在微观层面切实见到实效。

五是社会政策托底才能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好的社会环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必然带来一些阵痛，涉及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但是这是必须要过的槛，必须要经历的一次阵痛。所以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两个基本，也就是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现在的就业形势、财力规模、保障制度同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这次可能要有阵痛，但我相信不会很大，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

四、做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央确定的工作方针是战略上坚持持久战，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但是不能够因为是持久战，当前就不干了。所以，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打歼灭战。明年主要是五大任务，叫“三去一降一补”。

一是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有些产品价格再怎么下降，消费总量也已经不会再扩大了，钢铁和煤炭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价格一直在下跌，但是去年煤炭的消费总量和今年粗钢表观消费量总量上都会净减少，原因是产能过大。僵尸企业没有及时实现市场出清，在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扩大投资解决不了问题，长期下去会把行业当中的优质企业拖垮，最后一起死。所以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坚定地处置僵尸企业，实现去产能，使产能和总的需求量大体均衡，止住价格下跌的趋势，让优质企业看到希望，增强信心。处置的信心是坚持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这是总的方针和原则。接下来要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在财税支持、不良资产的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专项奖补，对处置压力大的一些地区要给予专项奖补，以及在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支持。

二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是五中全会就确定的一项50项重大新举措之一，所以明年就开始要做，我国总的来看收入还是中等收入，8000多美元，但很多方面的成本偏高，呈现一种未富先高的现象。所以必须要从全球的视野，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样一个问题。我国的创新能力在不断提高，但是目前还不足以弥补快速上升的成本减弱的竞争趋势，所以要尽量保持和延长竞争优势，必须下决心降成本，否则长期下去很多企业会被高成本压垮。企业没有盈利一两天可以扛下去，三四年以后恐怕就撑不下去了，所以一手要去产能，当然去产能并不一定是所有的行业都这么做。另一手是要降成本，这是普惠性的。微观主体有活力了，经济才能有持久的发展动力，所以明年要实行“七降”，在七个方面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这个总的判断是：现在的房地产库存，包括建好的和在建的，相对于现有户籍人口肯定是多了，但如果加上2.5亿多非户籍人口而言可能就不多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体制和机制不鼓励甚至限制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购房和租房，所以中央确定明年要在两个方面深化改革：一是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方案已经有了，但是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二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和上一轮的要有所区别。这次住房制度改革基本方向已经确定了，要以满足新市民的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为新市民服务，即2.5亿非户籍人口，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对有能力直接买房的仍然支持包括非户籍人口在内的城镇居民购买产权房，对一时买不起的，支持他们先租房，因为大多数人实际是不可能一下买得起的，特别是对农民工、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对难以承受市场化房租的，而且符合条件的，政府可以给予租金的补助，公报当中也有一句话，叫做把公租房扩大到所有的非户籍人口。所以，为此要大力鼓励支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现有的库存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等等，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多元主体的房东，让他们先买房子，然后出租，为此也要取消过时的一些限制性措施。

四是扩大有效供给，就是补短板。从不同收入群体来看，农村贫困人口是短板，从产业来看，现代农业是短板。刚刚开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现代农业基础建设是一个要加强的地方。新兴产业是短板，从产品来看，生态产品是短板。从产品的质量来看，高品质的产品是短板。从资本来看，刚才曾培炎理事长已经讲到了，相对于物理资本而言，人力资本是短板。所以，要提高投资的针对性、有效性，针对短板来进行投资，包括打好扶贫攻坚战，加强农业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以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当中的短板。

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是底线，在结构性改革当中，一些风险点会水落石出，会显露出来，但掩盖不是根本之策，所以既要守住底线，也要对信用违约依法处置。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要做好存量置换，完善全口径的政府债务管理，对金融风险要加强全方位的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的专项整治、间接遏制、非法集资蔓延的势头，妥善处置风险案件等等。

抓好上述五大任务要有两方面的保障：一是全面改革的保障。要重点推进对结构性改革有重大意义的国企、财税、金融三大改革以及具有兜底作用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时要推出一批对“三去一降一补”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二是政治保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尤其是企业家、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以上是我个人对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一些体会，仅供大家参考，讲得不一定对。谢谢大家。

魏礼群:

感谢杨伟民同志的精彩演讲，下一位演讲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同志。宁吉喆同志演讲的主题是：解读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精神。宁吉喆同志参加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起草工作，也是中央宣讲团的重要成员，他对中央的决策部署有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有请。

**宁吉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读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

尊敬的曾培炎理事长、尊敬的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2015—2016中国经济年会，年会的主题是引领新常态、决策“十三五”，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会议请我讲讲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的学习体会，我也很荣幸，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我准备分三个部分讲，与大家交流学习《建议》的体会。

第一部分，讲一讲“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虽然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但我们还是要看到，过去的五年我们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要增强进一步发展的信心。今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再过几天就要进入“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了，“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是很不平凡的，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即将胜利实现，具体来说，24个规划的指标基本都能完成，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我想从10个方面举一些数据来说明重大的成就。

一是我们的经济速度实现了较快增长，预计五年的GDP增长率是7.8%，这个速度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多一点，在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快的。

二是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预计GDP达到68万亿人民币，折合10万多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明显超出其他的发达国家。当然，我们的人均GDP刚刚达到7800美元左右，还处于中等收入的水平。

三是要看到我们的物质生产水平持续提高。东西没有很难过，东西多了也有问题，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农业方面，粮食产量保持世界第一，今年达到1.2万多亿斤，实现了十二连增。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农业稳、天下稳。工业方面，生产力的水平持续提升，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工业的规模是世界第一，制造业规模也是世界第一，占了世界30%多。虽然我们还不是世界工业强国，但已是当之无愧的工业大国。在铁路、电力、电信、手机、电脑、家电等设备和产品水平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最新一期的经济学家杂志就是中国的火车，上面有一个五星，因为12月接连有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都已经开工启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我们的铁路水平已经上来了。

四是基础设施水平也是全面提升。水利方面灌溉面积回升到50%，无论是高铁的里程、铁路的里程、公路的里程、电力的装机，在世界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手机的用户12亿户，网络用户7亿户。

五是经济结构也在调整中优化，我们最关心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这个结构也在改善。消费额占GDP的比重，五年前是50%左右，今年1—3季度已经超过了60%，消费上来了，投资下去了。大家关心的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现在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也在改善，五年前三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4%，今年1—3季度已经超过了50%。

六是城乡和区域结构也在不断改善，城乡人口结构，就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五年前不到50%，今年预计是56%。城乡收入的差距五年前是3.5：1，现在已经降到3：1以下。地区的差距也在缩小，人均GDP最高的省份和最低的省份，五年前是7：1，现在是4：1，最高的是天津，最低的今年很可能是甘肃，去年是贵州。

七是科技教育能力明显增强。R&D占GDP的比重超过2%，达到了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企业的投入占到80%。反映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教育投入3.28万亿元，比2009年翻了一番，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37.5%，达到了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八是居民收入和经济同步增长，就业不断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四年年均增长7.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前四年增长10.1%，都快于7.8%的GDP增长率。农民收入的增长又快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所以才有了城乡差距的缩小。五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接近5500万人，比规划的指标多出1000万人。

九是节能减排的力度加大，单位GDP能耗前四年降低13.4%，今年预计下降5.9%，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今年预计要达到12%，比预期的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都持续减少。

十是改革开放迈出大步，在开放方面，这五年实现了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出口第一大国，货物贸易占全世界的13%左右，虽然今年贸易的速度有所下降，甚至是负增长，但是占世界的份额还是稳住了。去年中国也是引进外资的第一大国，引进外资超过1200亿美元，境外投资是第三大国，接近1200亿美元。简政放权，国务院机构审批事项减少1/3的任务两年就完成，商事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先照后证，实缴制改任缴制，现在三证合一，一证一码。这两年全国每天新设企业一万家以上。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发展建设和执政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第二部分，“十三五”时期发展的环境、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我们的发展环境，《建议》中用两句话作出了总的判断：

第一句话，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全球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还在深入发展，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和平的外部环境，这是可以争取的。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美国、欧洲、日本今年虽然曲折艰难，特别是美国也有复苏的迹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机器人、3D打印、石墨烯材料、绿色低碳技术、非常规传统能源等等，现在都在孕育着产业上的突破。从国内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也没有变，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深化的阶段，所以市场的空间、发展的潜力和回旋余地都很大。需求还是有空间的。供给方面，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生产要素、综合优势也还存在，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这都是《建议》作出的大的判断。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会议的主题，我们的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会为我们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第二句话，我们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将长期存在，世界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特别是今年，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国内看，三期叠加，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结构性的矛盾、趋势性的矛盾、周期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当然结构性矛盾凸显。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

总之，既要看到机遇，又要看到挑战。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要准确把握经济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适应把握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更加有效的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的新境界。这是《建议》作出的大判断。

发展的指导思想：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五为一体建设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确保如期建成小康社会，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发展的目标要求：总的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建议》当中说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都翻一番，总书记在说明的时候说到这样经济增长速度要保持在6.5%以上。还要注重各种指标的平衡衔接。

二是产业要迈向中高端水平，当然整个发展都要迈向中高端水平。提高效率和企业效率，工业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也要进一步提高。服务业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要达到更高，现在超过了50%，将来要达到55%以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明显增加，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在说明当中提到要达到45%，现在是30%多。要迈向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的行列。过去中央定过科技进步贡献率到2020年达到60%。

三是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要普遍提高，就业比较充分，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逐步提高，收入差距缩小，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我国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实现脱困，贫困县全部脱帽，解决区域整体贫困问题。中央刚刚开了扶贫脱贫工作会议，都作出了明确的部署。

四是生态环境的质量要总体改善，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要大幅提高。能源的总量、水资源消耗的总量、建设用地的总量、碳排放的总量都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现在实行总量和强度双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总量要大幅减少。当然，《建议》的目标还有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等等，目标勾画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蓝图，我们在有限的五年内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应该说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第三部分，“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和重大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明确发展的重大任务。我重点讲讲创新方面，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放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学习《建议》体会，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的任务：

一、要培育创新引领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新动力。当然首先是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全社会创新创业的体制政策和社会环境，实行普惠性的创新支持政策。把草根创新和精英创新结合起来，还是要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们的高铁就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上集成创新的成果。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发挥创新领军人才的作用，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国家实验室。当然，知识产权、人力资本这些尤为重要。

二、要创造新技术、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的新供给。刚才杨伟民谈了体会，今年供给侧的改革，我们既要创造新供给，还要调整供给的结构。要分类指导，有保有压，有进有退，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三、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释放消费投资出口新需求，还是要继续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促进作用，来支持稳增长，把稳增长和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

四、拓展区域产业基础设施，网络经济、蓝色经济等发展的新空间，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完善水利、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通用航空、管道、邮政等基础设施网络，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刚才曾理事长提到软新基础设施的建设，我觉得非常重要，这是结合科技创新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重大的工程。

五、构建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新体系。

六、构建行政体制、企业、市场、财税、金融、农业、对外等方面的新体制。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加强发展的协调性，《建议》提出四方面的要求：

一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这次年会上专门有这方面的专题，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这四大板块的协调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新的区域支撑战略，当然还加上建设主体功能区这些区域发展的要求。

二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解决三个1亿人的问题。1亿人是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要在城市落户，主要在东部，还有1亿人在中西部就地进城落户，还有1亿棚户区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刚才杨伟民提到的2.5亿人，和这个是有交叉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四是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强环境治理力度，构筑生态安全的屏障。

开放和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深入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包括完善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建设等等。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个任务很艰巨。要增加东部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的素质，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的均衡发展，当然也包括全面实行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特别是脱贫工程、攻坚工程，去年还有7千万人，按照2010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计算，经过今年一年的努力，又解决了将近1200万人的脱贫问题，今后五年还有6千万，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补上这个短板，实现全体人民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魏礼群:

谢谢宁吉喆同志的精彩演讲。下面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张宇燕同志长期从事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全球经济治理新趋势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问题。

**张宇燕（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当前国际经济形势**

尊敬的曾培炎理事长、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今天能有机会给大家报告一下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

刚才在致辞中曾培炎理事长已经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做了非常精准的概括，就是四低一高，低主要是经济增长率，全球今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只有3.1%，低于去年的3.4%。还有一个低是贸易增长，今年WTO在年中的时候估计全球的贸易增长能够达到3%左右，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目标的实现非常困难，按照美元的计值，因为美元升值了，这样全球贸易增速可能会超过负的10%。再一个低是通货膨胀，发达国家七国今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只有加拿大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达到1.2%，剩下的六个西方主要经济体，他们的通货膨胀都在1%以下，最近的数字都是徘徊在0.1、0.2的水平。低还有大宗商品，在过去一年半里面，石油的价格降低了70%，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在18个月之内。高是高债务，人类走到今天经历了债务最高的历史时期，根据麦肯锡全球机构的估计，当今世界的公共债务、私人债务、企业债务加在一起超过了200万亿美元，全球的GDP只有70多万亿，GDP和债务之比达到了270%，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达到过的水平，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2007年—2014年这七年间，全球的债务净增57万亿美元，这个增长幅度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这是四低一高。

2015年的经济，我们在看经济时还有几个变量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就业。发达国家就业率普遍在改善，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了5%，欧元区失业率比去年降了大概1个百分点，这也很不容易，他常年都在11%、12%，今年降到了10%多一点。另外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投资，2014年全球投资负增长16%，下降幅度非常大，今年预计能够增长10%左右，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也难以维持。即使全球的直接投资今年增长了11%，也仅仅只达到1.4万亿美元，这离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1.9万亿左右的全球直接投资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金融领域的问题，今年我们从股市、汇率、利率几个角度看全球的金融形势，特别是在金融市场上，联动非常明显，8月份中国的股市出现波动，马上纽约股市一下下跌5%，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0%，我们看到股市的联动非常明显，而且波动很大。

从利率来看，今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美联储刚刚决定加息，即使加息，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全球的利率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实际利率，伦敦同业银行间的利率半年期的，在过去三年实际利率都是负的。今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汇率变动非常频繁，而且幅度非常大，像巴西兑美元的汇率贬了30%，美元升息以后，阿塞拜疆、阿根廷的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都在40%以上。全球80%多的国家货币兑美元出现了贬值，贬值幅度很大。我刚才说的是整个2015年经济形势。

思考2016年全球经济的走势，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加以关注：

第一，国际货币金融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在增加，风险在积累。不确定性一是来自美国美联储的加息政策，他加息的速度、时间以及力度。现在只是微调了一下，0.25个百分点，不同的估计，有说明年要加到1.5，甚至有人说要加到3%，后年达到4.5%，各种各样的说法，这给世界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二是刚才说到的超低利率，利率非常低，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美联储加息也是考虑到连续这么多年的超低利率导致了债务的迅速积累。债务的迅速积累，又是超低利率，再加上低通货膨胀、低增长，低利率、高负债，这样形成了一个有毒组合，这种有毒组合谁都知道是不可持续的，如此低的利率，如此低的通货膨胀，如此高的债务，这是不可持续的，大家开始担心，担心债务问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国际清算银行今年6月份发表的报告对目前超低利率的政策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说各国央行的行长把自己逼入了困境，这个困境使得金融市场大起大落，调整推迟，增长乏力，债台高筑。同时还导致了资源的错配，资金都流到了股市、债市和房地产市场，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另外是风险的积累，目前全球的股市泡沫又开始集聚形成，今年4月份的数据显示，全球股市的市值是75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股票的市值，那时候只有64万亿美元。目前看，美国房地产价格今年10月的数据，他有一个房地产建筑商建筑指数，目前的指数大概是过去十年指数的最高点，显示房地产泡沫也已经起来了，特别是影子银行的整个规模又在迅速积累。根据世界金融委员会的报告，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全球影子银行的规模在10月份又达到了全球GDP的128%。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影子银行的规模是当时全球GDP的130%，所以现在我们方方面面的看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觉得全球金融风险还是在不断积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再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今年全球的增长，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表现不错，从去年的1.8提高到了2.0，有人对明年的预测比较乐观，但是这种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靠需求管理，靠超低利率来维持。我们看一些长期因素，发达国家的长期因素，比如劳动力的供给，美国劳动力的供给未来几年增长只有0.2%，是非常低的，人口老龄化在欧洲、日本是非常明显的，在美国也是存在的。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是非常慢的，根据美国大型企业联合会的计算，过去三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几乎是零，在没有大规模技术进步、技术突破的前提下，发达国家的长期增长实际也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新兴经济体从2010年金融危机复苏之后，那时候的增长是7.5%，连续五年一路下滑，今年只有4%。很多人认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进入了低速增长轨道，恐怕还要在这个轨道里延续一段时间。有不同的原因，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认为，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五大周期同时结束，投资周期、信贷周期、改革周期、国际经济贸易周期等等五大周期同时结束，今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一个报告，专门讲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增长面临的五大风险，里面涉及到了政府的监管、产权保护制度、人口结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宏观因素等等。

总体来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的增速，我们估计是大致和今年差不多。最后我再说一下我们对明年全球增长的估计，我们认为在不发生大规模传染性很高的金融危机的前提下，全球增长能够实现3%的增速，和今年的水平差不多。我们认为不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或者是传染性很强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概有80%的概率，但一旦要发生危机，我刚才说金融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全球的增长可能增速还要进一步放慢。我就汇报到这儿，谢谢大家。

魏礼群:

感谢张宇燕研究员的精彩演讲。刚才曾培炎理事长的精彩致辞和三位嘉宾的精彩演讲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学术价值和决策价值，相信对大家会有启发和帮助。也给接下来中国经济年会的讨论开了一个好头。年会的主题演讲到此结束。接下来由我的同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赵进军同志主持专题论坛：深化改革开放，释放发展潜力。

**专题论坛：深化改革开放，释放发展潜力。**

主持人：赵进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各位来宾、各界朋友，我很荣幸担任这一时段专题论坛的主持人。这一时段的主题是深化改革开放，释放发展潜力。一共将有四位演讲嘉宾，围绕这一主题给大家介绍、阐述他们的思想观点。分别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扬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

首先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先生给大家做主题为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演讲。大家都知道，李荣融先生长期参与我们国家国有企业的领导管理，可以说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知名的、专家级的领导。欢迎李荣融主任。

**李荣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大家早上好，从1979年改革开放算起已经36年了，如果说国有企业改革以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31年了。今天10分钟让我讲这些题目，我想讲两点：

第一，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现在各种说法很多，但是很重要的是要牢牢把握方向，这就要回顾我们已经走过的路，来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心。所以，为了这个讲话，我重新又把这些决定学了一遍，十二届三中全会当时对国有企业的讲法，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这是决定当中的原话。所以当时的着眼点叫搞活国有企业，我认为没有过时，无论是哪个所有制企业，无论怎么评价我们的经济，按我的评价就是有没有活力，没有活力就没有希望，尽管现在很困难，有活力，我相信一定有希望。经过了九年的探索，我认为这个时间不长，代价也不算太高，但是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用了16个字：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这起，1993年已经定了这个方向，到1999年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若干决定，这个决定我自己理解就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面诠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尽管之后的路很困难，因为大家知道1998—2000年是国有企业脱困的三年，成为了国民经济沉重的包袱，但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没有停止，撤销了九个工业部，这么多的企业关闭破产，下岗分流，再就业，咬住了。通过三年，如果说成绩很大，我认为过高，但是逐步摆脱了困境。当时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也很大，国家的财政收入很可怜，外汇储备也很可怜，但是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没有动摇。到2002年，十六大对国有资产管理的体制改革作出了重大的决定，从我学习的认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里程碑，因为这次会议很重要，对政企分开这样一个体制上做了重大的改革，所以才有了后来一个阶段的所谓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10年，从2002年算起，国有企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包括效益、税收，都在15%以上，哪个国家有这个速度？所以美国的财政部每年来看我，他说你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说你应该访问我们财政部，我跟你不对口。他说美国如果要有像你中央企业100来户，交的税能够占国家财政收入20%左右，我这个财政部长就好当了。每年增加的税收交给国家的超过1200亿，不是1年，是10年，所以由国民经济的沉重包袱变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靠的是什么？坚定不移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去改革，不动摇。

困难的时候不动摇，好的时候也不要动摇，所以我离任时最担心的就是两条：一是政企分开变成政企合一，政府干预越来越多。不要说国有企业，其他所有制企业，如果是政府干预多的，我相信一定搞不好。这是历史证明的。十六大以后到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叫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应该说这是对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的催化剂。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提高两个能力，我认为目标很清楚，要回顾这段历史，坚持现代企业制度就有希望，扎实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就有活力。如果没有活力，国有企业没有活力，我不相信我们的经济会有活力。在这十年不要光看国有企业，我们其他所有制企业同样突飞猛进，民营企业也在发展中不断提高，所以经济的活跃程度，我相信回顾历史都看得出来，哪一段是活跃的，哪一段是死气沉沉的。再回过来看，当初十二届三中全会着眼点是完全正确的，今天叫我评价经济，评价企业，我仍然说活力。后来要求国企三句话，活力、影响力、控制力，没有活力谈不上后面两条，所以我认为当前要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抓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仍然是把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牢牢抓住，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关于学习淡马锡。讲到国企改革就牵扯到学习淡马锡。到去年建立了40年，今年是41年，40年的成绩我给报一下，对国家GDP的贡献是13.5%，平均每年派红7%，股东的投资回报率年均是18%，可以说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金融危机，他都经历了。朱镕基总理当时带我去，我在国家计委工作，去那边看了10分钟，99年，他们报告的一句话是我底下的企业无一亏损。朱总理指着我，他说你听听，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是我相信，路走对就有希望。所以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淡马锡，可以说淡马锡的40年是新加坡国有企业改革成功走出的一条路的40年，也可以说新加坡淡马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功的典范。咱们讲的16个字他都做到了，而且是与时俱进，美国不少人吹捧，我也认真学习，安然是不是现代企业制度，应该说是，雷曼是不是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但是都哄然倒下。反过来再去看看淡马锡，他公司治理结构有他的特色，那两个为什么倒下？要我说有一个重要原因，董事会失效，都是做假账，说得重一点是诈骗犯，所以建立董事会是淡马锡治理结构当中很重要的环节，没有他不会有40年的辉煌，而且还要与时俱进。所以，他对董事会有一整套的制度，对董事的管理，对董事日常的沟通都有规定。

所以至今可以说淡马锡值得我们学习，关键是学什么。有的说淡马锡，新加坡政府的出资人代表就是财政部。我说2003年之前确实我们国家也是财政部，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财政部，2003年以后才有了国资委，国资委的授权当时也是试点，范围不大，确定的是非金融的经营性资产，还要受国务院授权的，在那个非金融的经营性资产当中，国务院授权部分是国资委。所以我认为，形式一定要服从于内容，今天要谈这个题目，我想要说的形式一定要符合内容，当前中国最要抓的不是别的，就是怎么有利于政企分开就怎么做。不客气地讲，现在去问不少高官，问他国资委为什么叫特色机构，能正确回答的我估计不会超过30%，为什么政府管理越来越多，他不清楚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和出资人职责都混在一起，能搞好吗？历史证明搞不好。所以，重点要向新加坡学习的第一位的是政企分开。

我拜访过李显龙，我问他，你这位总理对国家淡马锡的投向有没有想法？他说当然有想法。我说你怎么办？他说我们派出了董事，有董事在董事会大，如果董事会投票决定不同意，我总理也只能接受。我说这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没有15、20年是做不到的。但如果做不到，要谈国有企业改革，基础不对。什么原因？说话的人不负责，负责人不说话，这怎么能搞好？要学习淡马锡的第二条，要认真学习他的公司治理以及公司治理结构，不是一成不变，要与时俱进。现在淡马锡的投资70%在海外，在新加坡占30%不到。所以，40年成就，我想应该正视这样的现实，不去争，我们要做的是学完了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认真做，要总结我的发言就是：坚持方向，加快步伐，扎实推进。谢谢大家。

赵进军:

感谢李荣融副理事长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就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工作发言。

**张晓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工作**

今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总体要求和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等十方面的任务，文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需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

五中全会《建议》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开放等五大理念，要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三五”开局之年的开放工作提出了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强国际产能和设备制造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六方面的任务。根据上述精神，我想讲一个重点任务，就是关于加强国际产能和设备制造合作。

我感觉这是构建新体制、开创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新举措，具体可以从三点看：

第一，这是适应我们结构调整迫切需要，通过开拓产业发展空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一个新举措。我们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多种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若干产业产能过剩问题非常突出，钢铁、建材、光伏发电设备，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我们具有工程技术性价比、建设工期等方面的优势，比如我们不仅是煤电装机世界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我们现在的60万、100万千瓦超过临界发电机组的煤耗、排放水平也是居世界一流。再比如说我们10月19日和印尼签了雅万高铁的协议，当时一些日本人说中国人是在吹牛，他们三年工期做不到，我们就向外方介绍，中国京沪高速铁路1300多公里，三年半建成的，曾理事长那时候就是京沪高铁领导小组的组长，我们不是吹牛，雅万高铁才100多公里，我们三年完全可以建成。

第二，这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新举措。因为新世纪以来，我们对外开放战略形成一个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对外投资也好、对外工程承包也好，都是快速发展。但如果再加上一个国际产能和设备制造合作，就可以使我们的资金优势、工程建设优势和设备制造优势有机结合，更加充分发挥我们的综合竞争力。比如我们过去走出去，铁路、港口、公路建设能力为世界前列。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自己在一线工作，他去争合同只讲工程质量好，造得快，人家说你能修350公里的吗？咱们中铁建设说没问题，你要多快能修多快。但是说到融资，将来运营是一方面，他说这和我没关系，我是包工程的。通过我们对于投融资经营、设备制造这样一种组合，就是产能和设备制造国际合作要求的积极开展工程承包加融资、加运营以及设备制造合作这样一种多方式的合作，可以使我们的走出去迈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深化我国与多国互利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有效措施。因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现在一部分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但是也更重视本国的产业水平提升，使矿能资源在本地有深加工和增加本国就业，不满足于只是贸易出口、进口你的设备或者是你来做工程承包。通过充分考虑所在国的需要，现在确定我们的产能设备和制造的国际合作近期以亚洲周边国家和以非洲为主，注重和当地政府、企业的合作，为当地创造更好的发展基础，能够更好的体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深化南南合作。与此同时，我们也强调中国的国际产能和设备合作可以与具备条件的国家，包括法国、英国、美国等这些发达国家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合作架构，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比如中国政府已经和法国达成共识，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今年中美二轨对话前习主席会见美方参会代表，对中美经贸合作提了三点：一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二是加强投资贸易往来，三是可以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美方代表反映是非常积极的，我们推进这样一种合作，可以缓解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拼力竞争的局面，形成一个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的格局，这样也有利于南北合作，拓展一个新的空间。

坦率地讲，开展国际产能和设备制造合作刚起步，真正要有效实施还要花非常大的功夫，比如有的企业对当地的文化、宗教、资源保护重视不够，在管理体制上还不完全适应，存在着无序甚至是恶性竞争的现象，这就需要坚持企业主导、政府推动、突出重点、有序推进、注重实效、互利共赢、积极稳妥、防控风险的原则，扎实工作、开拓创新，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际产能和设备合作不断取得实效。谢谢大家。

赵进军:

谢谢晓强副理事长的精彩发言。下面请金融专家李扬先生就金融体制改革发表看法和建议。

**李扬（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金融体制改革**

尊敬的培炎副总理，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理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现在的第一身份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理事长。这个实验室也是同我们发展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同时获批的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我今天的任务是谈金融体制改革。

首先要讨论一个方法论问题，金融改革是非常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过去谈金融改革通常是按照金融的部门，我们会谈机构改革、市场改革、工具、金融服务、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然后是国际协调，我们通常会按照这样的顺序和结构来展开金融改革。这个也对，但是现在看起来是有缺陷的，因为金融如果离开它的服务对象，就是一个飘忽不定的东西，有可能会变成虚拟经济。危机以来，全世界金融体制的调整和改革都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我今天讲五方面的内容：第一，主要讲当前实体经济的发展对金融改革提了什么要求。后面四个是根据这些要求展开具体的金融改革的内容。我不按照机构、市场的逻辑来讲，按照实体经济要什么我们就改什么，就发展什么的路子和大家来讨论。

“十三五”我们面对的实体经济的状况不用多说了。全球经济仍然坚持不可能有很好的表现这样一个看法，中国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当然我们也进入了经济的新常态，在“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是6.5%，预计“十四五”的速度会有所下降，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实体经济的状况。这样一个实体经济的状况对金融改革提出了什么要求？三个要求：一是要支持五大发展。五大发展是五中全会的一个新概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金融改革要以这样五个发展来定位。二是我们要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以及由它不可避免的带来不良资产增多的局面，要有效防止金融风险，这是绕不过的，特别是今后三年，将会是我们的不良资产集中爆发的时期，所以金融改革无论说什么，都必须以这个为非常重要的目的。三是要加强监管的协调，提高整个体制防范风险的能力。实体经济对金融改革的要求就这三点。

大家比较习惯的觉得金融就是给钱，现在通过危机看到，金融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为实体层面的资源有效配置提供一个有效的环境，至少提供一个不干扰的环境。这样来看，在金融领域中三个“率”最重要：利率、汇率、国债收益率曲线。利率决定于价格，资源怎么配置，怎么才是有效配置，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利率。汇率决定于我们要用好国际国内两个资源，要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来配置中国的资源，因此汇率是否有效，是否达到均衡水平就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汇率不合适，如果扭曲的话，配置的效率是降低的。收益率曲线，对微观的所有金融企业来说，产品的定价，一个债券为什么发这个利率，一个理财产品为什么是这样的收益率，国债为什么收益率会比其他的要低等等，要决定于要有一个收益率曲线，这是所有金融产品定价的基准，没有这个基准，所有的金融产品是有可能定价无效率，从而引导的资源配置是无效率的。所以，在下一步的金融改革中，我们要完成“三率”的市场化。这“三率”市场化的任务在三中全会决定中已经提出，三中全会以来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在今后这一两年里要把它攻克。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

第二个要做的事，我们有五大发展，习近平主席反复说，第一位的是创新，因为没有创新我们不可能走过未来这样一个艰难的道路。所以，金融的任务就是要支持创新，同时无论你怎样来界定今后的人民任务，投资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创新也罢，新产业也罢，第一个环节是投资，要支持金融的有效投资。创新的问题，对金融来说，要支持创新，金融的理念要转变，要能够容忍犯错误，因为创新是经常犯错误的，十个创新成功一个，那九个是犯错误的。金融如何去支持这样一个很容易犯错误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我们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是不允许犯错的，犯错误终身追究。因此我们现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结构必须改变，我们必须发展按照三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决定，发展以直接融资为主的结构。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很明确的，如果投资还是那么重要的话，我们要支持投资。对中国来说，现在投资千头万绪，什么样的投资最缺资金支持？长期投资。无论是城市化，无论是新型工业化，无论是把眼界推广到全球，“一带一路”，都是需要长期投资的，而中国现在金融体系能够聚集来的资金是短期的，短期资金支持长期投资，这就是我们金融改革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解决长期性、股权性资本供应的问题。

中国资金的第二个问题是按照我们的金融体系动员起来的资金，提供给资金使用者的时候，基本上是形成资金使用者的债务，而债务太高，杠杆率就高，所以我们还必须解决债务率过高的问题，因此提供股权性资金就是我们的又一个任务。所以在这样一个总任务下，我们要解决长期性资金和解决股权性资金的问题，所以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股票市场方面我们觉得主要是发展支持草根创业的市场，支持地方创业的市场，因为现在上面的市场已经足够使用了。我们应当有更多的形式，要发展更多的产业投资基金，要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商业票据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任务也是相当繁重的。我们给了一个比较，用股权市场来比较，中国股权市场上，从主板到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是头重脚轻的，和美国比较，最好的市场和最低级的市场相比是正型金字塔，这符合事物发展规律，高档次的少，低档次的多，而我们中国是高档次的多，低档次的少，于是后力不济。我们用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下一步所谓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问题，主要是草根的问题，主要是地方的问题，这一点思路我们必须改变。

第三个问题是降低杠杆率。我们知道，五中全会中首次把降低杠杆率作为战略目标。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又一次把降低杠杆率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大家知道这次危机是发达国家杠杆率高引发的，现在在危机进行了这段时间之后，一个凶险的语言认为下一步的危机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杠杆率过高造成的，其中中国是大家最关注的国家。对这样一个凶险的预言我们不可不察，所以五中全会我们就细查了这一点，就有了这样一个决定，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讲到杠杆率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概念，大家经常会混淆使用，一个是杠杆率，一个是资产负债率。杠杆率是总资产对权益资本比重，资产负债率是负债对资产的比率，我们降的是前者。今年6月完成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现在已经有了12年的数字，从12年的数字可以看 到中国的杠杆率是在提高的，尤其是最近这一段，2009年开始迅速提高。

再看看部门的情况，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不断提高，提高的关节点也在2009年，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不断提高，关节点也在2009年。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提高，在中国企业出问题，银行立刻出问题，银行出问题，财政立刻出问题，财政出问题，经济马上就会出问题，这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逻辑。所以我们必须要观察中国非金融企业的问题，负债率从2007年的54%上升到2014年的60%，负债占GDP的比重从195%上升到317%，杠杆率从98%上升到149%，上升非常快，难怪五中全会把降低杠杆率作为任务。

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变化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跳跃性增长也在2009，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下一步我们在应对经济下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吸收09年的经验。但是我们现在讲杠杆率的状况讲的是债务，我们筹集债务也都是为了做投资，因此必须结合资产做分析。结合资产分析之后，我们的结论是相对乐观的。如果按总量算，中国到2014年底资产净值103.3万亿元，多于一年的GDP。但这里面很多是非流动性资产，把这些扣除，比如土地、房地产等等，净值是28.5万亿，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是我们真正的财富。这个数字公布之后，国际上有一些评论说，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分析，中国是可以应付1.5次危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真正在今后遇到问题需要处置时靠的是这样一些债权。

去杠杆有很多措施，我们说了从分子、分母两个角度介绍，政府和央行承接债务，现在都在做，但是都有很多弊端，很到问题。分母对策就是扩大GDP的规模，这里我们要讲到容易被混淆的问题，去杠杆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是两个概念，微观层面可以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可以把债务替代，宏观层面没有任何这种办法，宏观层面只有把GDP做大，同时控制好债务，这是非常困难的任务。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都是以去杠杆为首要目标，但是七年多下来，增加了58万亿，所以我们在提出要去杠杆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里面的艰辛，要做好充分的做长期奋斗的准备。

五中全会决定中关于下一步金融改革有一句新话，就是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所谓是新话，过去谈机构改革就是一句话，市场化。而这次是四种类型的机构并举，而且相互补充，分工合理，所以如此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原因还在进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在下滑，有很多问题要处置。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单纯的商业性金融是解决不了的。二是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很多新任务，很多新的领域，特别是有很多投资领域，所有这些新领域，单纯的商业性金融也支持不了，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中央才非常有远见的提出了四类金融并举且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

我们今后面对的金融改革和以往不同，最主要就是定位不同，我们要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规范我们的改革方向和发展方向，我相信我们的任务一定能完成。谢谢。

赵进军:

感谢金融专家的精彩演讲。我想金融在我们国家的经济，乃至于让我们的国家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人注目。

下面进入互动环节。由于时间关系，互动时间规定10分钟。请大家踊跃举手提问，同时控制好时间。

记者:

请问尊敬的李荣融理事长，具有生命活力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它主导的混合型经济的结局是不是就是把没有生命活力的国有资产被收购、被兼并或者是被消亡的问题。谢谢。

李荣融:

混合所有制还没有这样提的，但是客观地讲，我一直在找案例，有哪一位民营资本收购了国有资本，收购完了以后这个企业在行业的地位比原来更高，更好，如果有，请你们推荐，我来学习，因为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但是我们合资的企业有，大的一汽也好、东风也好，上汽也好，加入了外资，比原来地位高，比原来发展的好，这些案例很多，我在我原来工作过的无锡找，很多都变成私人企业了，没有一个企业比原来的地位更高，在行业中的影响力更大，我还没有找到。所以不要简单看形式，要注意内容。混合所有制也好，其他所有制也好，我认为这都是形式，它的本质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怎么有利于提高，我认为它就能够生存，而且这种形式，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区应该不一样，而不是一刀切。供你参考。

记者: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李荣融副理事长，我们都知道您之前大力推进国企重组，现在国资委监管下的央企大概是108家，目前有重组的预期，有些人认为现在重组的步伐太慢了，您是不是这样认为？您认为未来重组的形势是怎样的？谢谢。

李荣融:

晓强让我发言我考虑了半天，因为这个题目讲得太空的话你们不欢迎，讲得太实也有人不欢迎，所以重组，我原来在任的目标是60户到80户，我不会去分类，我只有一个类，就是行业排队要给我前三名。我的着眼点，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其他资本，都应该考核他的效率，如果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我认为你这是违背市场经济的。要让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决定什么？就是决定资本的流向。所以我在任的时候要求必须前三名，首先在国内前三名，然后在国际前三名，达不到就卖掉。资本应该流到好的企业，应该流到效率高的企业，在行业排第一位的为什么要卖掉？我搞不懂。企业重组往哪儿走，是你定还是市场定？我认为应该尊重市场。所以在我在任时企业的重组决策我从不代替他，因为我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时候到德国学习，人家教给了我一生要记住的话：就是谁决策谁承担责任，不承担责任别决策。所以，你要按这个讲的话就很清楚，政府该做什么事，企业该做什么事，都清清楚楚，我想只有这样，效率的提高才会持续。谢谢。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转型升级**

大家上午好。给我出的题目是供给侧的改革和产业升级。供给侧改革是一个热门的话题，高新词，解读也比较多。我看到一种说法，是不是就不讲三驾马车了？更有一种极端的说法是不是要搞新的计划经济？我觉得这个就扯得远了。应该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改革是有明确定义的，我的理解是要推动要素市场的流动、重组、优化组合，要校正扭曲，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从产业升级来讲，我以为是要解决好三个问题：退出一批、优化一批、升级一批。

第一，退出一批，一是去产能。我觉得产能问题其实既有结构问题，也有体制问题。现在产能问题比较突出的，像重化工业，我最近访问了一个煤炭企业，这个煤炭企业生产一吨煤的成本大概400块钱，销售200块钱，销售一吨煤将近亏本200块钱。我问他能不能不生产，他说必须要生产，因为一万多职工在那儿，不生产不行，而且煤矿关了以后，将来的成本更高。另外，银行不答应，因为向银行借了很多钱，你现在关门的话我的不良率马上就会暴露。中国最近几年面临大的调整，其中重化工业是一个方面，同时也有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出口产业。我们过去的增长通常是20—30%，今年已经是负增长了。这个领域中我们听到了很多消息，包括有些工厂在关闭，有些企业家跑路等等，实际上也是相当大规模的调整。但是，你没有发现有僵尸企业，他不会在那儿亏本生产。现在去产能的问题，特别是重化工业中，相当多是国有企业，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刚才荣融同志讲到了国企改革方向的问题，我以为这个方向应该是明确的，就是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有资本应该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支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支持科技进步，保护生态环境，保证国家安全。这些说法是比较清楚的，问题是怎么来实行。

在这个过程中，现在讨论国企问题比较多，我们能不能总结一下，看看我们这么多年国企改革有没有好的例子，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实际有三个案例我们可以很好的研究：一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他的收益率将近10%，现在各种金融机构来讲，收益率都不算低。他是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大飞机公司。大飞机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需求，我们把这个公司搞起来以后带动了中国一大批产业的升级。三是深圳TCL搞了一个华新光电企业，是一个生产面板的企业，现在很不错。初创期深圳市投了50%的股份，企业搞起来以后逐步退出，这都是国有资本应该干的事，现在严重过剩产能的行业，国有资本怎么办，我觉得应该退出，在这些企业资产债务重组过程中把它退出来，把这笔钱用于充实社保资金，来解决这些领域中，在企业关闭重组过程中人的问题。

第二，优化一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指出我们要降成本，我们的物流成本、融资成本、通信成本高，原因在于一些基础行业还是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看法，但是这个问题恐怕回避不了。怎么办？还是要放开准入，鼓励竞争，降低成本。我经常鼓吹比较多的，能不能拿电信做一个例子。最近一段时间，我宣讲“十三五”规划，到斐济进行访问，一架飞机，三个电信运营商，80万人口，80万人口的小岛国有三个电信公司相互竞争，我们的电信行业，克强总理要求降资费，社会上呼声也比较高，最近据说也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很多人现在还是有担心，是因为你让他降，而不是自己要降。如果有一个充分的竞争，他自己要降的时候，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建议，在这个行业能不能放进去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不仅仅是虚拟运营商，让它进去竞争一下，搅一搅，有点鲶鱼效应，还是以国有资本为主，能不能把成本降下来。降成本是对仍然存在行政性垄断问题比较突出的基础性行业，这个改革恐怕还是要往前推。

前一段时间我们搞了改革，主要是放小，比如小微企业，注册制，提供了很多便利，但是大的垄断性行业能不能放进去一个大的投资者、生产者，如果这个事情能做的话，才能够真正凸显我们推进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坚定的决心。

第三，升级一批。我想讲一下日本的经验，日本在50年代、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他们一个很成功的经验是加速折旧。通过加速折旧，日本的设备通信改造速度很快，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产业政策要准，在这个方面我们能不能再做点文章。加速折旧的问题决策部门是比较重视的，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把这个面能不能更大范围的推开。最近讲供给侧的改革，很多人讲减税的问题，我记得加速折旧相当于减税，但是它比一般的减税更有好处，好处在于鼓励企业购买设备，推动技术档次的提升，也扩大了投资的需求，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推动技术进步，又扩大了投资的需求，可以说是一箭多雕，通过这些办法来推动我们产业的升级。

简单来说，供给侧的改革对产业升级就是退出一批、优化一批、升级一批。谢谢大家。

赵进军:

特别感谢刘世锦同志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坚持把演讲讲完，非常精彩。刚才四位专家对我们本时段的主题做了深刻分析和精彩的答问，可以概括地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因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才能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充分调动自身的优势，全面释放发展的潜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胜利之本。

感谢各位演讲嘉宾的精彩演讲。本时段的专题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平行论坛一：加快创新驱动，实现绿色发展**

**第一时段 创新发展**

主持人：朱之鑫（全国政协常委）

非常荣幸作为下午平行论坛的主持人之一，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专家的演讲。大家知道，今天的题目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引领新常态，决胜“十三五”。新常态起码有三层意思大家是共识的：一是增长速度的变化，二是整个结构的优化，三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怎么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今天下午的论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创新发展。创新发展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也是整个经济发展核心位置上的重要问题的。下午参加论坛的有四位嘉宾，分别是：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先生；工信部副部长冯飞先生；中国商用飞机公司董事长金壮龙先生；腾讯公司副总江阳女士。在今天的午餐之后，四个人的发言将给大家带来一次很热烈的讨论，让大家享受一次精神的午餐。首先请陈晓华演讲。

**陈晓华（农业部副部长）：发展现代农业**

大家下午好。再过几天“十三五”的帷幕就要拉开，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上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就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介绍一些情况，谈一些自己的想法。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现代农业要取得明显进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把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提出农业要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道路。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今后一个时期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作了全面的部署。可以说，现在农业现代化的进军号已经吹响，我们回顾一下“十二五”，现代农业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也就是大家说的粮食连续12年增产，已经好几年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上了一个新台阶。农业物资装备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比如农业的科技贡献率已经达到了56%，农业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了61%，灌溉面积占比已经达到了52%，几项重要指标已经过半。而且农业生产经营的方式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各类新的经营主体已经超过250万家，大田生产、畜牧业养殖的规模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农民的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今年有望突破万元大关，已经连续六年的增幅，高于城镇居民的增幅，也就是说城乡收入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农业的好形势为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当然我们要看到，现在农业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还很多，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质量效益不高的状况、竞争力不强的状况还很突出，现代农业的发展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仍然是短板和弱项。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变的关键时期，所以从农业发展的情况来看，很重要的就是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我们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初步考虑“十三五”要坚持一个目标、围绕一条主线、突出一个中心、实现六个全面提升。五中全会提出农业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这个要求是不低的，不采取非常的措施很难实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现代农业要取得明显进展，这个要坚定不移。一条主线就是要加快农业方式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很重要的就是要从过去的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由过去主要通过要素投入转到依靠科技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上来，由过去从资源消耗转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来。这个转变也可以说带有革命性。一个中心就是要保持农民收入的持续发展。我们要继续“一个翻番”、“两个高于”的目标。“一个翻番”就是收入翻番。现在分析收入翻番有一定的条件，但是“两个高于”难度非常大。就是农民的收入要高于GDP的增长，高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要保持这种势头。“六个全面提升”就是要全面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水平，不必再追求连年数量的增长。

一是数量是基础，是必要的，要把重点放在巩固和提升产能上。要实施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的战略。

二是全面提升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首先是要抓科技的创新，抓物质技术装备、农机装备的水平提升。现在大马力的拖拉机，包括一些高端的设施，农业检验检测设备大量是进口的，我们想通过工业2025来解决好这个问题。

三是全面提升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水平，核心是要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我们现在的竞争力弱，这是一个短板，我们的产出水平并不低，但是劳动生产率低，所以和发达国家农业比，没有竞争力，才导致现在的国内外价差拉大，一些产品的进口增加。

四是要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我们知道公众现在对食品安全的问题非常担忧，群众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做工作的着力点，所以我们“十三五”保证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摆在突出位置的，要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五是要全面提升农业的经营效益的水平，我们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一步就可能影响农业的生产稳定，所以提高农业的效益，是下一阶段农业发展的重点。

六是要全面提升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我们制定和实施农业的可持续规划，概括起来讲就是要达到一控、两减、三基本，一控就是控制用水总量，两减就是要减化肥、减农药，到2020年我们想要做到零增长，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够节能增效，做到这一点才有利于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环境的安全。三基本包括农业的废弃物，也就是大家关心的秸秆，死亡生猪，包括地膜，这些要基本做到可回收、资源化的有效利用。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下一步我们想着力在打造农业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现代农业的经营体系这三方面来着力，从而构建起现代农业的基本框架。

朱之鑫:

刚才陈晓华部长就发展农业现代化谈到了主线的问题、中心的问题和六个全面的问题，农村工作会议刚刚开完，今年的粮食又获得了丰收，12429亿斤，农民收入有可能超过1万元，城乡收入之比降到了2.9：1，这些都是我们取得的成绩。农业既是短板，同时也面临着现在粮食库存多了，这次讲去库存包括粮食的库存，可以研究一下。下面请工信部副部长冯飞同志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制造的2025，这也是我们整个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冯飞（工信部副部长）：中国制造2025**

谢谢。非常荣幸能到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个论坛上和大家交流中国制造2025，实际中国制造2025是从今年5月份对外发布，已经开始正式实施。发布以后得到了社会，特别是企业界积极的反响和行动，我想不是一个新话题。对于这样一个话题，我今天怎么讲，我主要谈两点认识，不是作为工信部的领导，而是作为我个人。

第一，中国制造2025的魂是什么？大家都听说过，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新型的工业化国家又开始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甚至有些国家提出来再工业化。再工业化的灵魂，或者说它的切入点，德国提出来工业4.0，美国提出来先进制造业，具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叫做工业互联网。韩国提了制造革新3.0，英国制造2050，比中国还长远一些，未来35年发展的勾画。法国提了新工业法国，明确了34个领域。

从这些国家做的这样一些战略来看，聚焦在一点上，就是把互联网技术和制造技术能够更紧密的结合，中国制造2025实际它的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使得互联网技术和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融合后解决什么问题，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效率的提升。任何一个国家在做战略时没有提成本的下降，而是效率的提升是最重要的目标，还包括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快速适应市场的需求，这样可能会带来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三是提高即时性，对市场有快速的反映能力，创造发展的新空间。

各个国家的战略意图，或者说重点领域有所差别，美国软的方面比较强，互联网服务，特别是围绕着制造业的服务非常强，美国先进制造业和工业互联网的目标还是以软带硬。德国工业4.0的重要领域是以硬带软作为一个重要的特征。包括欧洲在内，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相对于美国，甚至相对于中国而言，发展相对差一点。比如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互联网企业当中没有一家欧洲公司，因此欧盟提出来数字欧盟统一市场的概念来补课，以硬带软。我想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造业大国，2010年我们就夺得了制造业全球第一的头衔，是在150年之后，中国又重新回到制造业第一的大国，当年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19.3%左右。中国怎么充分利用制造大国的优势，利用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软和硬同时推进，硬的方面尽管规模大，但是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的基础能力还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我想魂是这样一个魂。

第二，从各个国家竞争的制高点来看，基于平台的标准化可能是全球在争夺的一个重要领域，当然这里面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比如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基本上都是在建立一个平台来制定规则、标准，这就意味着工业的很多标准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比如统治工业领域，很多年的工业总线标准，大概全球有几十个，工业互联网时代，这个标准是基于IP的，正在做颠覆性的变化，因此，这样一个过程中，各国是争夺的制高点，中间有合作，有竞争。

在制高点的竞争中，对我们国家来讲，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特别是劣势。美国在主导的这项工作是GE，通用电器，德国在主导的是西门子，萨普等等这样一些全球性的大公司，这样一个巨型公司，从装备制造到工业互联网的开发，一体化的公司我们缺乏，我们必须要走联合的道路，因此我们在推动智能制造联盟的建立来解决在竞争当中解决先天不足。

中国制造2025，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实现制造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就是探索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再是简单的靠规模扩张、技术拿来主义的方式，我想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解决产业技术体系的问题。在中国制造2025五大工程当中要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特别是战略性高端共性技术，我们要解决供给机制的问题。二是解决基础能力的问题。我刚才讲到，我们虽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制造业的体系，但很多基础，比如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关键工艺技术，我们还没有夯实，所以在中国制造2025当中，我们也有一个工业强基工程。三是要解决绿色发展的问题，制造业的绿色制造的工程。刚才陈部长讲到了环境的问题，实际工业的用能占到全社会用能的70%左右，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之关键，我们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能效方面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现在正在制定绿色制造工程，也就是说通过这三点来改变我们的产业发展方式。这是我要给大家报告的一些内容。谢谢。

朱之鑫:

感谢冯飞部长的介绍。2025规划在整个工业制造之后是一个非常好的规划，对于下一步整个的装备工业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讲到了个性化、即时性、平台以及共有技术、基础技术，特别谈到了标准的问题。昨天我召开一个座谈会，大家也共同谈到了标准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标准，实现2025可能还会有难度。下面请金壮龙董事长做报告，他是中国商用飞机公司董事长。

**金壮龙（中国商用飞机公司董事长）：企业创新**

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汇报一下我的想法。我今天要重点讲的是围绕企业创新，围绕企业创新我讲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单谈一谈对企业创新的理解和看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就是我们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议，规划建议中提出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一个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把创新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建议》中也提出要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加快形成若干专利性技术、专利性产品和专利性产业，在“十三五”取得一批丰硕成果。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发展态势，综合国力的竞争、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都把创新作为应对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竞争的国家战略。实践证明，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们国家抓住世界科技创新机遇、应对国际经济竞争挑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举措和必由之路。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个重要的方面，我认为是要坚持以企业创新为主线。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提升竞争能力、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我觉得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的技术创新。二是企业的管理创新。三是企业的体制创新。

我国企业创新的发展态势，近十年来越来越好，有三个表现：一是我国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部分行业领军企业达到了国际同类企业的先进水平。比如大家都高兴地看到，我们现在已经组建的中国中车集团、我原来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华为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已经在迅速崛起。二是以企业为主体，承担一批重大科技工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比如大家都关注的，我们国家曾经在2006—2020年推出了16个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以来成果丰硕。以企业为主体，坚持自主创新取得了重大突破，成效是显著的。比如载人航天工程，大家都知道的神舟号飞船，探月工程，又比如说国家载人深潜，蛟龙号，这些都是重大科技专项实施以来以企业为主体开展的一些重大工程。三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对标国际一流，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我举三个方面的需要继续嫁加强的环节：

第一，作为企业界来说，企业创新能力仍然较为薄弱，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意识。我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不少美国的大企业和欧洲的企业，我感觉他们的创新能力，创新意识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中国制造缺乏中国设计，中国创造的核心竞争优势，刚才冯部长已经介绍了中国制造2025，我们的大飞机项目也是在2025中有明确描述的。

第二，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高水平的人才，特别是关键领域，突破关键技术的领军人才相对不足，持续调动创新人才的创造热情和创造活力，体制机制有待健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来要把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激发出来。

第三，政府政策的引导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加快形成政府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

这是关于对企业创新我的见解。

第二部分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商飞公司这几年来创新的探索和实践。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中国商飞公司，很多人都知道大飞机公司，我们这个公司组建于2008年，到目前七年多的发展了，发展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研制喷气式客机，我们刚刚组建时队伍也很可怜，2千人都不到，现在经过七年的发展，我们坚持把大飞机事业扛在肩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贯穿到大飞机研制全过程。坚持“三创”理念，就是创新、创业、创造的理念，我们把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作为主基调。这几年我们一边规划、一边建设、一边研制、一边引才、一边探索，全面推进ARJ-21新直线飞机、新919大型客机和未来新型的远程宽体客机项目的研制。

这个过程中，我们围绕创新方面重点介绍四个方面的创新：一，创新公司治理结构。大家都比较关心中央企业，目前我们是唯一的中央企业与地方参股，与相关行业的旗舰企业共同投资的多元组织机构，像中航工业、宝钢、中国铝业、中国中化，都是我们的股东单位，我们是一个多元的模式，我们建立了主要由外部董事构成的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机制，形成了权责明确、监督健全、有效制衡、协调运行的组织架构。

二，主要是企业管理创新。主要是创新企业管理体系，提出来打造COMAC管理体系，这个名称现在在国际上被大家普遍接受。重点打造以客户为中心，围绕产品实现过程，坚持自主创新，整合全球资源，协同高效运行，持续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的COMAC管理体系，我们也进行了创新项目管理体系，采用RPT团队，实行六位管理，也就是计划、技术、质量、经费、能源等的管理，这方面我们也做了探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三，也是我们最关键的一点，我们要创新技术创新体系。着力构建民用飞机的技术体系，因为大家平常说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这个项目能真正找到多少案例，我们也做了探索。因为我们这个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怎么真正实现以企业为主体，以中国商飞公司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我们的产品如果不能适合于市场，我们的飞机是卖不出去的。我原来搞过军工，军工拿出来不要也得要，其他地方买不到。但商用飞机不行，我们的三大航可以不选择你的产品，所以要求更高，我们现在已经初步搭建了一个多专业融合、多团队协同、多技术集成的协同的科研平台，打造国家民用飞机的科技创新建设平台，我们国内有36所高校参与了技术攻关和课题研究，有效形成了成果的快速转化机制。通过大型客机项目的研制，带动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群体性突破，比如ARJ-21、新919先后攻破了100多项先进技术，交大、清华大学都参与了我们国家这个项目的研制。

四，我们主要在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探索。我们一搞企业很容易走到什么都要自己干，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做了大的创新，我们提出来要按照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主制造商供应商的发展模式，就是小核心、大协作，聚全国之力、聚全球之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的举国体制优势，最大限度的聚集和利用国内外资源。我们经过几年的探索，已经构建了以中国商飞为核心，联合中航工业、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体系。开展了广泛、多元、深远的合作，目前我们这个产业链有22个省，200多家单位，特别可喜的是，我们在供应链里面有一大批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比如杭州的西子公司，已经承揽了飞机的结构件，他们说他们亏本也要干，我们热烈欢迎。龙头单位只能央企牵头，一般来说要长期忍受煎熬，盈利很难得到。但是产业链我们希望混合所有制，广泛参与，现在效果已经慢慢出来了。

这四个创新的探索之外，还有三个要素很重要，这是我们公司正在打造的：第一，凝聚创新人才。我们这几年先后招募了4500多名优秀毕业生，我们现在1万人中35岁以下的占了72%，我们吸纳了126位国际专家。40位中央千人计划。培育了22位特级试飞员，还有40位试飞工程师，项目成功靠人才，没有人才干不成事。第二，培育创新文化。如何形成一个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我们提出来打造大飞机精神。我们提出来四个长期：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吃苦、长期奉献，我们干了七年才稍微有一点声音，这个活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也有可能会受到挫折，甚至会遇到失败，但是我们不要怕挫折，不要怕失败。第三，打造创新品牌。品牌方面，我们经过七年努力，我国第一款直线飞机是ARJ-21，是90坐机的，前几天已经正式交付给成都航空公司了，这个飞机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这是第一款，这个飞机一旦投入运营，我们国家现在航线上有2千多家喷气式飞机，没有一家是中国的，要把这个历史终结掉。我们168坐机的C919经过七年的奋斗，前一段时间已经下线，但是下线不等于万事大吉了，下一个挑战就面临着首飞，还要试飞取证，我们也正在竭尽推进中。我们未来新型的远程飞机也准备起步。

总体来说，大飞机事业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探索性的工程。研制一款国际标准民用飞机风险大、任务重、周期长、挑战多，不会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蹴而就，任重而道远。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各位在飞机的研制历史上遇到一些困难，希望大家给一点帮助和支持，我们取得一点成绩，多点一个赞，但自身要努力。谢谢大家。

朱之鑫:

谢谢金壮龙董事长的报告。创新实际最早是由美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来的。这个概念实际在不断引申，从原来的科技创新到后面的管理、体制、文化，实际上熊彼特已经提出了五个方面。今天金壮龙董事长对企业的创新也做了很好的诠释，包括技术创新，包括管理创新，包括体制创新，也包括文化创新，我想这对我们实现创新的发展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下面请腾讯公司副总裁江阳女士做互联网的报告。

**江阳（腾讯公司副总裁）：互联网+**

朱之鑫:

非常荣幸作为下午平行论坛的主持人之一，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专家的演讲。大家知道，今天的题目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引领新常态，决胜“十三五”。新常态起码有三层意思大家是共识的：一是增长速度的变化，二是整个结构的优化，三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怎么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今天下午的论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创新发展。创新发展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也是整个经济发展核心位置上的重要问题的。下午参加论坛的有四位嘉宾，分别是：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先生；工信部副部长冯飞先生；中国商用飞机公司董事长金壮龙先生；腾讯公司副总江阳女士。在今天的午餐之后，四个人的发言将给大家带来一次很热烈的讨论，让大家享受一次精神的午餐。首先请陈晓华演讲。

陈晓华:

大家下午好。再过几天“十三五”的帷幕就要拉开，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上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就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介绍一些情况，谈一些自己的想法。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现代农业要取得明显进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把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提出农业要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道路。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今后一个时期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作了全面的部署。可以说，现在农业现代化的进军号已经吹响，我们回顾一下“十二五”，现代农业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也就是大家说的粮食连续12年增产，已经好几年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上了一个新台阶。农业物资装备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比如农业的科技贡献率已经达到了56%，农业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了61%，灌溉面积占比已经达到了52%，几项重要指标已经过半。而且农业生产经营的方式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各类新的经营主体已经超过250万家，大田生产、畜牧业养殖的规模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农民的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今年有望突破万元大关，已经连续六年的增幅，高于城镇居民的增幅，也就是说城乡收入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农业的好形势为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当然我们要看到，现在农业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还很多，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质量效益不高的状况、竞争力不强的状况还很突出，现代农业的发展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仍然是短板和弱项。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变的关键时期，所以从农业发展的情况来看，很重要的就是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我们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初步考虑“十三五”要坚持一个目标、围绕一条主线、突出一个中心、实现六个全面提升。五中全会提出农业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这个要求是不低的，不采取非常的措施很难实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现代农业要取得明显进展，这个要坚定不移。一条主线就是要加快农业方式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很重要的就是要从过去的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由过去主要通过要素投入转到依靠科技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上来，由过去从资源消耗转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来。这个转变也可以说带有革命性。一个中心就是要保持农民收入的持续发展。我们要继续“一个翻番”、“两个高于”的目标。“一个翻番”就是收入翻番。现在分析收入翻番有一定的条件，但是“两个高于”难度非常大。就是农民的收入要高于GDP的增长，高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要保持这种势头。“六个全面提升”就是要全面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水平，不必再追求连年数量的增长。

一是数量是基础，是必要的，要把重点放在巩固和提升产能上。要实施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的战略。

二是全面提升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首先是要抓科技的创新，抓物质技术装备、农机装备的水平提升。现在大马力的拖拉机，包括一些高端的设施，农业检验检测设备大量是进口的，我们想通过工业2025来解决好这个问题。

三是全面提升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水平，核心是要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我们现在的竞争力弱，这是一个短板，我们的产出水平并不低，但是劳动生产率低，所以和发达国家农业比，没有竞争力，才导致现在的国内外价差拉大，一些产品的进口增加。

四是要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我们知道公众现在对食品安全的问题非常担忧，群众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做工作的着力点，所以我们“十三五”保证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摆在突出位置的，要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五是要全面提升农业的经营效益的水平，我们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一步就可能影响农业的生产稳定，所以提高农业的效益，是下一阶段农业发展的重点。

六是要全面提升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我们制定和实施农业的可持续规划，概括起来讲就是要达到一控、两减、三基本，一控就是控制用水总量，两减就是要减化肥、减农药，到2020年我们想要做到零增长，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够节能增效，做到这一点才有利于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环境的安全。三基本包括农业的废弃物，也就是大家关心的秸秆，死亡生猪，包括地膜，这些要基本做到可回收、资源化的有效利用。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下一步我们想着力在打造农业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现代农业的经营体系这三方面来着力，从而构建起现代农业的基本框架。

朱之鑫:

刚才陈晓华部长就发展农业现代化谈到了主线的问题、中心的问题和六个全面的问题，农村工作会议刚刚开完，今年的粮食又获得了丰收，12429亿斤，农民收入有可能超过1万元，城乡收入之比降到了2.9：1，这些都是我们取得的成绩。农业既是短板，同时也面临着现在粮食库存多了，这次讲去库存包括粮食的库存，可以研究一下。下面请工信部副部长冯飞同志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制造的2025，这也是我们整个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冯飞:

谢谢。非常荣幸能到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个论坛上和大家交流中国制造2025，实际中国制造2025是从今年5月份对外发布，已经开始正式实施。发布以后得到了社会，特别是企业界积极的反响和行动，我想不是一个新话题。对于这样一个话题，我今天怎么讲，我主要谈两点认识，不是作为工信部的领导，而是作为我个人。

第一，中国制造2025的魂是什么？大家都听说过，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新型的工业化国家又开始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甚至有些国家提出来再工业化。再工业化的灵魂，或者说它的切入点，德国提出来工业4.0，美国提出来先进制造业，具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叫做工业互联网。韩国提了制造革新3.0，英国制造2050，比中国还长远一些，未来35年发展的勾画。法国提了新工业法国，明确了34个领域。

从这些国家做的这样一些战略来看，聚焦在一点上，就是把互联网技术和制造技术能够更紧密的结合，中国制造2025实际它的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使得互联网技术和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融合后解决什么问题，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效率的提升。任何一个国家在做战略时没有提成本的下降，而是效率的提升是最重要的目标，还包括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快速适应市场的需求，这样可能会带来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三是提高即时性，对市场有快速的反映能力，创造发展的新空间。

各个国家的战略意图，或者说重点领域有所差别，美国软的方面比较强，互联网服务，特别是围绕着制造业的服务非常强，美国先进制造业和工业互联网的目标还是以软带硬。德国工业4.0的重要领域是以硬带软作为一个重要的特征。包括欧洲在内，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相对于美国，甚至相对于中国而言，发展相对差一点。比如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互联网企业当中没有一家欧洲公司，因此欧盟提出来数字欧盟统一市场的概念来补课，以硬带软。我想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造业大国，2010年我们就夺得了制造业全球第一的头衔，是在150年之后，中国又重新回到制造业第一的大国，当年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19.3%左右。中国怎么充分利用制造大国的优势，利用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软和硬同时推进，硬的方面尽管规模大，但是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的基础能力还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我想魂是这样一个魂。

第二，从各个国家竞争的制高点来看，基于平台的标准化可能是全球在争夺的一个重要领域，当然这里面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比如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基本上都是在建立一个平台来制定规则、标准，这就意味着工业的很多标准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比如统治工业领域，很多年的工业总线标准，大概全球有几十个，工业互联网时代，这个标准是基于IP的，正在做颠覆性的变化，因此，这样一个过程中，各国是争夺的制高点，中间有合作，有竞争。

在制高点的竞争中，对我们国家来讲，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特别是劣势。美国在主导的这项工作是GE，通用电器，德国在主导的是西门子，萨普等等这样一些全球性的大公司，这样一个巨型公司，从装备制造到工业互联网的开发，一体化的公司我们缺乏，我们必须要走联合的道路，因此我们在推动智能制造联盟的建立来解决在竞争当中解决先天不足。

中国制造2025，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实现制造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就是探索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再是简单的靠规模扩张、技术拿来主义的方式，我想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解决产业技术体系的问题。在中国制造2025五大工程当中要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特别是战略性高端共性技术，我们要解决供给机制的问题。二是解决基础能力的问题。我刚才讲到，我们虽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制造业的体系，但很多基础，比如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关键工艺技术，我们还没有夯实，所以在中国制造2025当中，我们也有一个工业强基工程。三是要解决绿色发展的问题，制造业的绿色制造的工程。刚才陈部长讲到了环境的问题，实际工业的用能占到全社会用能的70%左右，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之关键，我们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能效方面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现在正在制定绿色制造工程，也就是说通过这三点来改变我们的产业发展方式。这是我要给大家报告的一些内容。谢谢。

朱之鑫:

感谢冯飞部长的介绍。2025规划在整个工业制造之后是一个非常好的规划，对于下一步整个的装备工业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讲到了个性化、即时性、平台以及共有技术、基础技术，特别谈到了标准的问题。昨天我召开一个座谈会，大家也共同谈到了标准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标准，实现2025可能还会有难度。下面请金壮龙董事长做报告，他是中国商用飞机公司董事长。

金壮龙:

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汇报一下我的想法。我今天要重点讲的是围绕企业创新，围绕企业创新我讲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单谈一谈对企业创新的理解和看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就是我们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议，规划建议中提出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一个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把创新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建议》中也提出要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加快形成若干专利性技术、专利性产品和专利性产业，在“十三五”取得一批丰硕成果。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发展态势，综合国力的竞争、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都把创新作为应对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竞争的国家战略。实践证明，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们国家抓住世界科技创新机遇、应对国际经济竞争挑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举措和必由之路。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个重要的方面，我认为是要坚持以企业创新为主线。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提升竞争能力、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我觉得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的技术创新。二是企业的管理创新。三是企业的体制创新。

我国企业创新的发展态势，近十年来越来越好，有三个表现：一是我国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部分行业领军企业达到了国际同类企业的先进水平。比如大家都高兴地看到，我们现在已经组建的中国中车集团、我原来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华为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已经在迅速崛起。二是以企业为主体，承担一批重大科技工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比如大家都关注的，我们国家曾经在2006—2020年推出了16个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以来成果丰硕。以企业为主体，坚持自主创新取得了重大突破，成效是显著的。比如载人航天工程，大家都知道的神舟号飞船，探月工程，又比如说国家载人深潜，蛟龙号，这些都是重大科技专项实施以来以企业为主体开展的一些重大工程。三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对标国际一流，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我举三个方面的需要继续嫁加强的环节：

第一，作为企业界来说，企业创新能力仍然较为薄弱，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意识。我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不少美国的大企业和欧洲的企业，我感觉他们的创新能力，创新意识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中国制造缺乏中国设计，中国创造的核心竞争优势，刚才冯部长已经介绍了中国制造2025，我们的大飞机项目也是在2025中有明确描述的。

第二，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高水平的人才，特别是关键领域，突破关键技术的领军人才相对不足，持续调动创新人才的创造热情和创造活力，体制机制有待健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来要把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激发出来。

第三，政府政策的引导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加快形成政府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

这是关于对企业创新我的见解。

第二部分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商飞公司这几年来创新的探索和实践。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中国商飞公司，很多人都知道大飞机公司，我们这个公司组建于2008年，到目前七年多的发展了，发展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研制喷气式客机，我们刚刚组建时队伍也很可怜，2千人都不到，现在经过七年的发展，我们坚持把大飞机事业扛在肩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贯穿到大飞机研制全过程。坚持“三创”理念，就是创新、创业、创造的理念，我们把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作为主基调。这几年我们一边规划、一边建设、一边研制、一边引才、一边探索，全面推进ARJ-21新直线飞机、新919大型客机和未来新型的远程宽体客机项目的研制。

这个过程中，我们围绕创新方面重点介绍四个方面的创新：一，创新公司治理结构。大家都比较关心中央企业，目前我们是唯一的中央企业与地方参股，与相关行业的旗舰企业共同投资的多元组织机构，像中航工业、宝钢、中国铝业、中国中化，都是我们的股东单位，我们是一个多元的模式，我们建立了主要由外部董事构成的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机制，形成了权责明确、监督健全、有效制衡、协调运行的组织架构。

二，主要是企业管理创新。主要是创新企业管理体系，提出来打造COMAC管理体系，这个名称现在在国际上被大家普遍接受。重点打造以客户为中心，围绕产品实现过程，坚持自主创新，整合全球资源，协同高效运行，持续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的COMAC管理体系，我们也进行了创新项目管理体系，采用RPT团队，实行六位管理，也就是计划、技术、质量、经费、能源等的管理，这方面我们也做了探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三，也是我们最关键的一点，我们要创新技术创新体系。着力构建民用飞机的技术体系，因为大家平常说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这个项目能真正找到多少案例，我们也做了探索。因为我们这个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怎么真正实现以企业为主体，以中国商飞公司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我们的产品如果不能适合于市场，我们的飞机是卖不出去的。我原来搞过军工，军工拿出来不要也得要，其他地方买不到。但商用飞机不行，我们的三大航可以不选择你的产品，所以要求更高，我们现在已经初步搭建了一个多专业融合、多团队协同、多技术集成的协同的科研平台，打造国家民用飞机的科技创新建设平台，我们国内有36所高校参与了技术攻关和课题研究，有效形成了成果的快速转化机制。通过大型客机项目的研制，带动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群体性突破，比如ARJ-21、新919先后攻破了100多项先进技术，交大、清华大学都参与了我们国家这个项目的研制。

四，我们主要在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探索。我们一搞企业很容易走到什么都要自己干，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做了大的创新，我们提出来要按照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主制造商供应商的发展模式，就是小核心、大协作，聚全国之力、聚全球之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的举国体制优势，最大限度的聚集和利用国内外资源。我们经过几年的探索，已经构建了以中国商飞为核心，联合中航工业、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体系。开展了广泛、多元、深远的合作，目前我们这个产业链有22个省，200多家单位，特别可喜的是，我们在供应链里面有一大批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比如杭州的西子公司，已经承揽了飞机的结构件，他们说他们亏本也要干，我们热烈欢迎。龙头单位只能央企牵头，一般来说要长期忍受煎熬，盈利很难得到。但是产业链我们希望混合所有制，广泛参与，现在效果已经慢慢出来了。

这四个创新的探索之外，还有三个要素很重要，这是我们公司正在打造的：第一，凝聚创新人才。我们这几年先后招募了4500多名优秀毕业生，我们现在1万人中35岁以下的占了72%，我们吸纳了126位国际专家。40位中央千人计划。培育了22位特级试飞员，还有40位试飞工程师，项目成功靠人才，没有人才干不成事。第二，培育创新文化。如何形成一个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我们提出来打造大飞机精神。我们提出来四个长期：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吃苦、长期奉献，我们干了七年才稍微有一点声音，这个活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也有可能会受到挫折，甚至会遇到失败，但是我们不要怕挫折，不要怕失败。第三，打造创新品牌。品牌方面，我们经过七年努力，我国第一款直线飞机是ARJ-21，是90坐机的，前几天已经正式交付给成都航空公司了，这个飞机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这是第一款，这个飞机一旦投入运营，我们国家现在航线上有2千多家喷气式飞机，没有一家是中国的，要把这个历史终结掉。我们168坐机的C919经过七年的奋斗，前一段时间已经下线，但是下线不等于万事大吉了，下一个挑战就面临着首飞，还要试飞取证，我们也正在竭尽推进中。我们未来新型的远程飞机也准备起步。

总体来说，大飞机事业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探索性的工程。研制一款国际标准民用飞机风险大、任务重、周期长、挑战多，不会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蹴而就，任重而道远。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各位在飞机的研制历史上遇到一些困难，希望大家给一点帮助和支持，我们取得一点成绩，多点一个赞，但自身要努力。谢谢大家。

朱之鑫:

谢谢金壮龙董事长的报告。创新实际最早是由美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来的。这个概念实际在不断引申，从原来的科技创新到后面的管理、体制、文化，实际上熊彼特已经提出了五个方面。今天金壮龙董事长对企业的创新也做了很好的诠释，包括技术创新，包括管理创新，包括体制创新，也包括文化创新，我想这对我们实现创新的发展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下面请腾讯公司副总裁江阳女士做互联网的报告。

江阳: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本来应该请马化腾来给大家做报告，因为他在国外，来不了，精彩程度不免打折，在此向大家致歉。

互联网+在今年是一个非常热的词，今年春天的一个会上一个副部长说乱花渐欲迷人眼，满城尽说互联网+。很多人都说这个词是马化腾发明的，我想给大家澄清一下，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但确实是由他倡导和践行的，我印象很深，最早的时候，马总给政府第一次介绍互联网+这个概念是到发改委演讲，那时候正好是朱主任主持，其实在腾讯公司内部已经用了这个词，那一年我们做了组织架构的调整，是为了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马总说欲做互联网+，先做互联网-，在我们公司内部，把我们不擅长做的东西作了一下调整。像电商我们做了很多年，当年一直做得不太成功，我们给剥离出去，还有搜索。当时马总在很多地方都讲，把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比喻像电，人类发明了电以后，电力给各行各业所带来的变化。

过去在PC时代互联网的用户数还没有那么普及，在2013年的时候，实际上移动互联网已经到来，我们也预见到这个变化是对人类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上网，PC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在很多形态上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我们用了互联网+这个词。从腾讯公司来，我们实际上战略非常清晰，定位也非常准确，我们实际只做两件事，一个是连接，一个是内容。连接是靠什么？是依靠腾讯的微信和QQ两大平台，还有微信的公众号，连接人、连接服务、连接物体，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腾讯公司不是BAT垄断，什么都做，别人没法做了，腾讯只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平台开放出来，与众多合作伙伴合作，我们现在在全国推的叫众创空间，在25个城市都有，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各级政府来找我们谈，希望我们在他们那边能够开众创空间。我们这个平台开放出来，有很多创业者在上面能够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非常保守的统计，现在至少有800万个创业者活跃在我们众创空间这个平台上。

我们有的是靠腾讯自己在生根，做内容，像游戏，腾讯的游戏从无到有，做到中国的第一，我们现在在游戏行业收入上是世界领先，排到世界首位。还有一个是文学，现在腾讯成立了影视公司，在内容这块我们是倾心打造。但是在很多纵深的领域，比如交通，我们实际都是靠投资，教育投了新东方，医疗投了挂号网，还有卓见，还有丁香园等等，还有很多O2O企业，实际都是靠投资在纵深领域发展，这是在互联网+这个领域。

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看到了移动互联网到来会带来变化，但是没有想象这么快，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数发展这么快，是很多欧洲国家都无法企及的。今年各级政府都在热烈的拥抱互联网+，腾讯和很多政府都签了战略合作协议，我们在互联网+城市服务上也做了很多探索，在微信中也开了很多城市服务号，有点相当于把政府的服务大厅搬到了手机上，明显可以看到能提高办事效率。我们现在大概在77个城市开通了城市服务，因为有的服务不是高频使用的服务，像结婚、离婚，所以有时候用的不是特别频繁。有的交通罚款可以通过微信城市服务的入口进去使用，明显提高了效率，正好今年有一个热词出现，“供给侧结构改造”，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确实能在供给侧改造上发挥积极作用。在教育健康领域，中国其实不乏很多创新的点子，前一阵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我陪着马总在医疗行业投资了三家企业，挂号网、丁香园和卓见科技，都在杭州，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互联网+医疗这块，浙江省确实走在前面，拿丁香园举例，77%的医生都在丁香园里面，有点像医生的社交网络，他们在帮助医患之间能够有效率的连接上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还有挂号网，其实这个企业最早是从网上挂号做起的，现在把医生资源也做上了，包括看病，最近乌镇成立的第一家互联网医院，背后也是他们在做。还有教育，腾讯在互联网教育这块利用QQ平台，开了腾讯课堂，我最近听他们介绍很吃惊，每天在这上面上课的人有19万，相当于5个深圳大学。上面的课程千奇百怪，什么都有，包括教农民怎么养羊，这确实能够把很多优质资源更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腾讯的QQ有一个家教师生群，很好地把家长、学校、老师联系在一起，他们在上面有很多探讨，怎么能够对孩子们因材施教，给不同的孩子留不同的作业，把网上的很多资源利用了起来。在这块确实看到了互联网神奇的作用，对提高效率、解放生产力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造，变革就会使一些人的利益受损，在这一侧发生的变化，我们要以一种更宽松的态度来迎接这些变革。谢谢。

朱之鑫:

谢谢江阳女士的介绍。实际上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正是最近讨论比较时髦的供给侧供给创造需求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范，刚才江阳女士也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创造的过程中本身有创造性破坏，创造可能要把原有的东西打破，要有宽容，要适应它。同时也需要有新的制度来保证它，这也是我们创新的重要方面。现在大家可以提问。

提问:

我是来自工信部国际合作中心的毛涛，目前在国经中心读博士后，跟着郑新立老师。郑老师想让我研究中国制造2025实施路径，我看了材料有点感触，我想问冯飞副部长两个小问题：第一，现在中国制造2025在实施过程中，包括北京、河南、甘肃等各个省都已经发布了行动纲要，现在一些地级市也在发布，像常州，因为发布也是一种实施的手段，以后越来越多的省份及地级市都会发。请问冯部长，您认为地方政府在制定行动纲要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第二，现在中国制造2025实施的过程中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产业结构调整，包括创新能力，还有资源环境约束。请问冯部长您认为在这几个方面哪个挑战最难实现？也想听听您关于应对这个挑战的看法。谢谢。

冯飞:

两个问题都很好，中国制造2025在推进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一轮的重复建设。社会反响积极是好事，地方政府积极是好事，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走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的老路，我们有很多教训。因此，在中国制造推进的过程中，怎么样避免出现这个问题，一是主张地方政府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基础来制定地方的中国制造2025实施方案。二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有意识的培育一些重点，特别是一些基础好的地区、能力强的地区，作为中国制造实施的重点地区。三是要加强信息服务，及时把各地的一些信息收集，然后向全社会传播，使得地方和企业可以在一个相对信息完备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最难的是什么，比较多，现在中国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和发达国家有比较大的区别，我们的制造业总体上是2.0，还有普及的问题，德国是4.0，我们有2.0普及的问题，3.0补课的问题，所以几个层次都有，所以推进的难度相对德国来讲，相对于其他的发达国家来讲，我们面对的困难要多一些，参差不齐。比如智能制造的推进过程中，很多地方、很多企业都在搞机器人的应用，我们层面的机器人应用是替代劳动的问题，是自动化的过程，还不是智能化的过程，层次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再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我搜集了很多资料，比如云计算、物联网，全球专利注册当中，美国的企业大致占了一半以上。机器人的专利，日本的企业占了一半以上，尽管中国这几年的增长还比较快，但是相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在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的掌握上，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优势在哪儿？就是市场加商业模式创新。我们的商业模式创新非常快，企业的创造力也非常强，超大规模市场支撑着商业模式的创新，这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但是，那些短板问题还必须要解决。谢谢。

21世纪经济报道:

我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我的问题提给冯部长。因为现在制约创新驱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大量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尤其是一些僵尸企业的存在。冯部长之前对这个也有一些表述和研究，不久前工业部也说要抓紧制定僵尸企业退出的方案，但是在具体操作路径上，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框架性的思路？比如如何处置人员安置和银行债务，钱应该从哪儿来，政府、银行、企业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谢谢。

冯飞: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到供给侧结构改革，有五大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去产能，所以去产能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要推进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这项工作目前正在做，正如您刚才讲到的，现在工业的大头还是传统产业。据统计，高技术制造业大致占制造业的比例是11%左右，一大块是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当中重化工业最大的结构性矛盾是产能过剩，完全靠市场机制来化解过剩矛盾还有些问题。我们尊重市场机制，政府要有适当的支持和引导政策来加速市场出清，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市场的优胜劣汰，这个原则是必须要坚持的。

刚才我说的那个词已经把路径跟大家讲了，以推进产业重组为主要的方式，多重组、少破产，使得社会的震动不要太大，目前发改委和工信部正在研究和制定方案的过程中，成型后会向大家报告。谢谢。

提问:

我们国家有一个现象，就是跟风，刚才冯部长也讲到了。我们能不能有一个顶层设计和顶层的做法，就是让我们的很多地方和国有企业不跟风。有这个顶层设计的话，我想在今后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任务会有帮助。刚才您讲到跟风的问题，讲到地方政府或者一些企业，我们在消灭一些产能过剩的同时又出现一些新的矛盾，能不能做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不让他跟风。

冯飞:

中国制造2025就是一个顶层设计，从全球的整个政策来看，我认为发达国家，包括市场经济国家，现在都在做供给侧的政策，工业4.0，美国的先进制造业，都是在做供给侧的政策。这些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战略性的，未必是你去怎么做，分工都分好，但是要有一个战略性的目标。

追问:

为什么会有一轮又一轮的产能过剩？或者一轮又一轮的重蹈覆辙？

冯飞:

那就比较复杂了，关键的问题，市场机制是矫正产能过剩的自身的机制，市场经济就是一个过剩的经济，它自身是有矫正机制的。我们出现的过剩问题严重，主要还是在于政府的定位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定位问题。第二，我们企业的行为是不是完全按照市场来做的行为。再加上政府的直接干预多，可能会扭曲企业的决策行为，我想主要还是这两点。第三，我们缺少退出机制，你要为你的过剩、决策失误而买单，而我们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刚才21世纪的记者在问这个问题，我们在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中就是要建立一个长效化的退出机制，好像大家都觉得进就是政府要取消各种障碍，退就得找政府，必须得有基于市场化的退出机制，这样才使得我们的市场更加顺畅，有进有退。谢谢。

提问:

尊敬的农业部陈晓华副部长，我有一个问题，面对着2007年中国大豆的市场定价权已经不在黑龙江了，是在美国的孟山都公司，面对着2008年中国的冻猪肉的市场定价权已经不在四川了，是在美国的高盛集团。现在面对美国所谓的民营企业，实际是他们的国家利益集团，又面对我们中国黑龙江和吉林省的玉米基地，农业部有什么预警机制建设和对策行动，因为国外的各个部委是有预警机制的，包括他们美国商业部对我们的华为集团的预警机制，作为农业部，在现在面对着他们对着我们的玉米基地，有何预警机制建设？谢谢。

陈晓华:

你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确实这些年国外的大豆和猪肉，逐步的替代玉米的一些粗粮，进口的数量是在增加，但是每类产品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从大豆而言，确确实实我们的市场需求很大，我们没有能力生产那么多大豆，我们的产量等等都很难达到竞争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都种大豆，就意味着不种玉米，不种水稻，实际上大豆这个事情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

第二，猪肉的进口是阶段性的，是临时性的，并不是常态性的，如果说有多进，那只是走私，那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冻品走私数量应该说和正常贸易相比不在少数，所以要加强打私来保护我们的国内市场。当然，如果要进口一些牛肉、羊肉，这是我们在一个阶段或者一个时期时候，由于市场紧缺，适量的进了一些，所以对动物产品而言，总量没有影响我们的产业，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第三，玉米进的多，主要是我们的玉米缺乏相应的竞争力。实际上玉米本身进的并不多，主要是玉米的替代粗粮，比如说大麦、高粱，这些产品在世贸谈判的时候是没有防护手段的，我们只是对几个主要的品种设置了必要的保护措施，而对这些没有设置保护措施，所以我们也很难抵挡它进来。对这几个产品，要针对不同的原因来采取不同的措施，不能笼而统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现在我们压力大的主要是保护国内的产业，所以我们准备第一要把高蛋白的东北大豆今后建立保护区，通过保护区的建立来保证我们对高蛋白大豆，说白了就是豆制品的需求，因为在这个领域，用于这个方面，我们是有竞争力的。而如果要去做混合油、油料，我们暂时达不到这个水平，所以这个进口是一种常态。对于玉米，我们本身的产量已经超过了市场的需求。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多管齐下，调整不合理的错配，一方面要把不适宜地区的玉米生产压下来，所以农业部提出，明年准备采取措施调减1000万，包括东北的高纬度地区采取粮豆轮作的办法。比如华北的农牧交错带，我们要退草，搞粮改饲。再比如西北的干旱地区，可以搞马铃薯，不要搞高耗水的玉米。再比如西南的石漠化地区，该退的就退下来，采取措施把量减一点。同时也要采取措施，通过对进口的调节和控制，不至于国内的产业受到更大的冲击。现在对农业而言，最关注的是玉米的问题，所以其他产业整体上和市场还是相适应的。

朱之鑫:

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阶段的论坛到此结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陈晓华部长、冯飞部长、金壮龙董事长和江阳女士的到来。谢谢。

**第二时段 绿色发展**

主持人：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下一阶段的讨论现在开始。第二个时段绿色发展现在开始，绿色发展是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大任务，也是广大老百姓的期盼。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出现连续的、大面积的雾霾天气，今天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很多人都戴着口罩，如果我们的发展要以付出人类的健康为代价，那就违背了发展的主要目的。应当说环境治理的技术，包括煤炭的清洁燃烧技术，汽车尾气的治理技术，水污染的治理技术，现在国际上都有，甚至大部分我们国内也有。现代的技术已经可以解决当前带来污染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有效的机制，能够把这些环境治理的技术切切实实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谁污染谁付费，推行第三方治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过去我们是谁污染谁治理，结果由于监管不严，谁治理了谁吃亏，谁不治理谁就赚钱。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我看到中央电视台到京津冀各个地方进行现场考察，很多地方的烟囱冒着黑色的烟，脱硫脱硝设备放在那儿，成了聋子的耳朵，没有开动，而且还振振有辞，现在是取暖的时候，这个时候来检查什么？很多现成的法律的规定，我们制定的排放标准，我们装了那么多设备，不能落到实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这样一个机制总是不能落到实处，使我们治理污染的效果大打折扣。

有一个传统的思维定式认为，进行高污染的治理必然会增加企业成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实际上如果我们全国统一强制执行污染的排放标准，真正推行第三方治理，这样所有的企业就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大家平等竞争，用发展环保产业的发展，用市场机制的办法，就能把三中全会提出的谁污染谁付费，推行第三方治理这样一个有效的措施落到实处。

今天请来的四位同志都是长期从事企业领导工作，从事环保工作，从事绿色科技和理论政策研究工作的，我想他们的发言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希望。首先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理事长傅成玉同志发言。傅成玉同志一生都在为中国的石化产业而奋斗，先后担忧中海油、中石化的董事长。我想他的发言一定会给大家启发。

**傅成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理事长）：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后企业责任与作用**

12月12日，全世界195个国家在巴黎达成了关于气候变化减排的协议，应该说这是全世界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里几十年来一个最重要的进步。习主席亲临大会，做了非常重要的发言，同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这部分也提出了明确的指标，即到2030年，我们的二氧化碳，也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要达到峰值，也就是说，2030年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60—65%，这是关于二氧化碳的排放。

我们争取在2030年之前实现这个目标。非化石能源比重要占到20%，森林的蓄积量要达到45亿立方米，这个任务非常重，按照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是能够实现这个指标的。因为我们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已经降低了33.8%，差不多14年，还有15年，再降低30%是没有问题的。非化石能源的比重，2014年达到11.2%，今年可能到12%。森林的蓄积率2014年达到了21.88亿立方米，总的看既有非常大的空间，也有非常大的挑战。我过去在企业工作，我觉得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国家达成协议，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承诺，是我们国家主席代表中国人民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但同时更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

我们是搞企业的，听了非常兴奋，兴奋是因为我们国家终于可以把压力变成动力了，把我们的差距视为潜力，为什么这么说？刚才郑主任讲，说我们以前企业在差距上拉得很大，大的原因不在企业，在政府，政府的执法不严，其实企业哪有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我们到了僵尸企业才想治，没到僵尸企业之前不让他死掉不更好吗？今天戴口罩了，没戴口罩之前我们都认真严格执法，会出这个问题吗？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把我们的环境治理好，同时又把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好，既解决全人类的问题，更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

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既是我们内在自身的要求，也是外在的力量的推动，因为我们国家承诺了，所以可以把党中央提出来的重要发展理念通过我们的实践来实现。党中央历来预示都是非常早的，我们看问题看得非常早，但是我们在下面的执行过程中就走歪了，比如在十六大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提出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六大就提出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那里面提出来技术创新的问题，环保的问题，节约资源的问题，走出一条技术含量高，也就是技术创新，经济效益好，也就是发展质量，资源消耗低、环保、节能、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用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可是我们走着没有坚持好，不是中央政策不好，所以这次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来五个重大发展理念，我们在讨论时就说，理念变成行动，中间不是我们个人的理解，应该把理念变成政策，变成制度，我们不缺理念，我们现在产能过剩，什么时候过剩？就是正在搞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为什么？不是科学发展观不对，是科学发展观理念对，但是我们国家经济运行靠政策，政策和发展观没有结合好，所以导致了现在产能过剩、出现了僵尸企业，在这方面我们要吸取教训，现在政府一分一厘都不能松，企业是逼出来的，不是养出来的。

所以，这次给我们带来几个机遇：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向绿色经济转型。中国将来的经济竞争力应该体现在绿色经济上，这个机遇将推动我们尽快的发展绿色产业；尽快发展绿色能源，调整我们的能源结构；要把节能、环保、减碳，总体设计、统一规划、同步推进。现在我们在做的节能是节能的，环保是环保的，都定指标，减碳的也提指标，我们国家要从两路发展，一路是建立新能源，绿色能源，另一路应该是做活增量，就是传统能源的节能和清洁化。在这里面，我觉得把存量做活更有意义，因为增量是要有新的投资，原来已经有的传统能源，如果把这个投资做活，我们通过提高能效、降低能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源，节约是第一大资源。现在我们能不能做到？很容易就做到，不是特别难，但是要花点成本，而且做出来效益还好。

再一个领域，通过这个会带动技术的升级改造。现在我们投资往往是基础设施，但是工业制造业、传统制造业不敢投，因为本来就过剩，产品卖不出去，但是我们应该大力投资技术更新改造，技术更新改造的切入点应该以节能降耗减排减碳为突破口，把节能降耗、减排和智慧制造两个切入口进行技术更新改造，做活我们的存量。

我们还会迎来更大的发展，就是我们会营造一个非常大的碳资产管理市场，会形成一个新的大金融市场。随着这些又带来一系列的围绕碳金融、碳资产的新兴产业、新兴服务队伍，具体来说，这些都能够实现，有几个原因，我给大家报一下。四年前我们开始把绿色低碳作为企业发展战略，我们搞了能效倍增，原来定的是到2025年能效提高1倍，到2015年实现20%，2020年能达到65%。能效提高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排放减少了，碳也减少了，后端的治理就会少。现在就能和环境保护、治理是三块，后期的治理变成了花大钱效果差，如果把前端治理从源头管理，就是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是事半功倍。我们花了四年时间进行碳排查，然后进行方法学计算，然后经过国际第三方认证。现在的碳我们那时候叫碳资源，全球都说把碳作为成本，既是成本，反过来又是效益。我们的节能减排也是一样，其实更大的是效益，花小钱得大益，在这上面，我们国家说2017年要全国统一性搞碳交易，国家搞七个省试点，试点下来，整个效益上我们交易了1.4亿元的二氧化碳，盈利了3000万。碳是可以大幅往下减的，主要是把能效提高，把能耗降下来，在我们这个行业中，能效提高会很快，能耗降低也很快。

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会形成一个新的能效管理指标体系，目前各部门管法不一样，所以形不成一个体系，在我们企业是一家，我们可以把整个能源管理、环境管理、减碳管理的协调能力统一到减碳，同时把平价企业的合理用能、经济用能和优化用能水平统一起来，在各个企业就能看到。其实用不同的能源成本不一样，排放的污染物不一样，比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不同的资源排放也是不一样的，在后面治理的成本也不一样，所以不能光说我用总便宜的，这在企业中要把它均衡管理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评价机制，我们做完企业的调查以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能源怎么分配，要根据排放出来的物质有多少，再根据治理花多少钱，整个周期全方位、全过程的进行评价，所以根据我们企业来看，比如燃料动力成本，不同的成本每亿吨标煤相差300元，排放的物质量或者污染物的量，每一吨标煤会差23千克，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差了400千克。治理成本上，每一吨标煤要差80元。综合评价就会发现我们不是光投入，还会有很好的产出。如果我们国家也在这方面能够统一管理的话，我们的整体效益会更大。

最后说一下碳交易，过去把碳当为成本，现在欧盟的碳交易，24年全世界大概是60亿吨，交易量600亿美元，欧盟占85%，我们国家在这几年的额度比较小，因为在七个省试点，大概交易12亿元，6000万吨。2017年，我们预计我们国家将有30—40亿吨二氧化碳的交易，达到80亿元的交易额，如果要考虑到期货交易，现在都说现货，这个可交易额可以达到600亿到4000亿元。这个对企业既是减排的机会，也是增效的机会。

我们连续四年对我们企业的100多个联合站，2000多套炼化装置，30000多销售站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碳排查，经过国际第三方审查认证，固化了我们公司温室气体计算量化的方法，摸清了公司在碳资产、碳减排上的家底。这样对碳资产的管理就形成了一套制度，现在和我们国家的主要管理部门，无论是发改委还是环保部，都形成了共识，对企业来说，如果2017年交易，就我们一家公司，我们碳的交易额可以到1000—2000万吨。如果我们国家把这个做大，再把污染排放做大，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新的资本市场，通过交易，这块企业贷款、企业融资都可以通过这个解决，同时又会发展出很多新的产业，比如技术研发的应用、工程设计建设、装备制造以及低碳资产的开发，这一系列的东西会形成更大的新产业。更重要的是在交易领域，又带出来一批新的中介机构。

总之，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新机遇，更是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发展、调整结构的很好切入点。谢谢。

郑新立:

谢谢傅成玉同志的发言，强调了中国对巴黎气候大会的承诺，要当成动力。同时从强化政府法律执法的监督和市场机制这两个方面推进环境的治理。下面请环保的主管部门，研究室主任夏光同志发言。

**夏光（环保部政研室主任）：加强环境保护**

谢谢郑主任，谢谢大家。我从绿色环保的角度谈一下对绿色发展的认识，特别强调我们推动绿色发展究竟需要从哪几个方面制定政策，我们把绿色发展政策提出三大动力的概念。我们都知道，现在绿色发展已经被列为“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就是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发展进程。它是一种发展的价值导向，或者说是一种外在的价值约束。

绿色发展如果严格来讲，它应该是所有发展领域的绿色化，包括我们所说的五位一体，政治领域也要绿色化，叫做绿色的政治发展，其他的包括绿色的经济发展，绿色的文化，绿色的社会发展等等。现在为了更好的集中，主要谈绿色的经济发展，也就是在经济领域中的绿色转型，是绿色发展的最主要部分，绿色经济的发展会带动在政治领域中的改革、转型和文化、社会建设方面的转变，所以是一个整体化的。绿色发展主要就是经济的绿色发展，或者叫绿色化的过程。

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绿色经济，绿色经济从字面上很清楚，绿色指的就是环保，或者说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很好，经济就是赚钱，所以绿色经济就是指那些同时产生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发展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理解，绿色经济的发展有两重含义：一是经济要环保，要把过去对环境不太友好的经济体系给改造过来，让它更加有利于生态环保，和自然相和谐。在这个意义上讲，把我们的经济体系进行改造。过去我们认为对环境不太友好的产业，比如钢铁、石化或者水泥、电力等等，听上去都是不够绿色，实际上只要我们把它改造得好，把它进行绿色化转型，它是可以成为绿色经济的一部分，而且将来还是绿色经济的主体部分，所以我们发展绿色经济并不排斥要发展传统产业。有的人认为我们将来要少搞基础产业，多搞高新科技就好了，实际上不是，实体产业还仍然是经济的主体，我们要保持。

第二重含义是要从环保要经济，要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节约能源等一系列的活动中去获得新的经济效益。新的环保过程也是我们获得经济效益的过程，美国的两位教授写过一本书，从绿到金，讲的是如何从绿化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也表明为什么世界上那些竞争力最强的公司往往都是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方面做得很好的公司，因为他们就是通过改造资源利用方式，减少排放这些过程来降低他的成本，获得更大效益的，所以这是它的两个含义。

从这样两个含义出发，下一步就可以说，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更加绿色化，主要是有两个动作，是两项外延，第一个动作是对原有的系统进行绿色化的改造。现在各个企业、各个行业各有各的神通，技术非常多，比如开发新的生产工艺，降低或者是替代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高效的循环利用原材料，降低污染物产生量，对污染物进行净化治理，以及对传统产业进行新型的设计等等，加上互联网等等新的手段，对于原来听上去对环境压力特别大的产业不一定要抛弃，也不一定把它转移到国外，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让它绿色化起来，这是第一项外延。

第二项就是发展绿色产业，有很多的产业从本意上来讲对环境生态比较友好，不会带来那么大的影响，比如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有机食品，可再生能源，还有服务业，高新科技，植树造林等等，还有很多新兴的业态，现在互联网时代特别多。各种各样的新型业态本身就对环境比较友好，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相对弱一点，我们的投资、发展主要集中在实体产业上，现在新型的产业兴起可以给我们带来既绿色又有经济的各种各样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发展绿色经济的第二大领域。这方面联合国环境署所倡导的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生物多样性、商业化和化学品管理、绿色城市、绿色交通等等这些都是将来发展很好的领域，我们的方向和联合国倡导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既然绿色经济的发展是我们整个绿色发展的主体，那我们也要把现有的经济形态推动到绿色发展的阶段上去，我们就需要动力。一般来讲，驱动一个物体运动需要三种力量：一种是推动力，一种是拉动力，一种是自身的行动力，我们把这三个合起来叫做绿色发展的驱动力。驱动力等于拉动、推动、行动三者结合。我们看一下这三个动力是什么意思？首先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是来自于外界的推动，实行从严从紧的资源环境、绿色环保方面的管制，是对产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这个最大的推动力首先来自于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央是最大的动力来源。中央确定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大理念以后，我们需要通过具体的环保政策、产业政策、司法体系改革、政治领域的强大约束等方面来对经济系统施加作用，推动它往前走，这几个方面是未来实施强大约束，也就是对经济发展有绿色的约束，这个约束本身就是对他巨大的推动。

第一，提高环境准入门槛。划定生态红线的意思是资源环境承载力很有限，我们过去搞经济发展，把这些承载力用得差不多了，很多地方是超载的，就像中央文件中说的，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已经接近或者是达到了上限。既然达到了上限，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实行严格的准入，不是什么产业都可以进来，不是什么经济活动都可以搞，一定要受到约束。这个约束首先是要制定特殊的国土开发规划，现在主体功能区规划已经划定了，划定完之后还要具体化，到一个地区或者到一个行业中，哪些产业冷搞，哪些产业不能搞，都要按照规划来做。现在很多地区已经在积极的划定红线，我前一阵到厦门市去调查研究时带我们参观了，在地上打了桩，哪些地方是生态红线，里面不能搞各种产业活动，有些是搞建设的土地，哪些产业是不能进入的，通过这样一种刚性的红线的设定，给经济发展一个严格的约束，这个约束保证了落后的东西以后不会再产生，而且逐渐随着红线提高标准，慢慢落后的东西都要退出落后产能，经济发展质量就提上去了。

第二，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现在已经颁布的环境保护法成为史上最严格的环保法。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已经出台，对领导干部要终身追责，要离任审计等等。环保法律法规方面，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逐步采取限制、淘汰的办法，当然也有优化一批、改进一批、深化一批的做法。通过执行环保的法律法规，使环境容量能够保持在稳定的状态。司法也是加强环保严格法律事实的一个重要领域，过去司法系统不太愿意介入资源环保的事情，觉得这些方面非常专业，法官不太懂这些东西，最好是环保部门处理，现在司法系统非常积极，两高专门发布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文件，把宪法和刑法所规定的触犯法律的污染行为具体化，排放了多少吨就属于什么样的级别的，都进行了量化，两高的积极推动，社会各个主体就可以有法律武器，保护环境，也保护他们的权益，严格执法。

第三，实行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制度。严格控制经济发展的决策过程。

第四，把环保纳入生产和消费全过程。我们要绿色化我们的生活体系。

二、拉动力。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在这方面，循环经济，绿色产业，清洁生产，综合利用，环保产业等等领域中都有大量的政策实施，现在需要进一步把它贯彻细化，而且要通过产权制度的一，让拥有环境容量资源的企业能够通过市场的交易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就是碳市场这些新的手段。

三、行动力，即企业和社会自身的创新能力。创新是解决既要环保又要经济发展这个矛盾唯一的出路，而且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也是一个创新能力比较强的国家。过去主要是激励大家创造财富，追求物质财富比较多，现在要通过政策的引导，把大家创新的能力引导到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领域中来，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措施，总结起来是两条：第一条是要进一步倡导或者是提升社会绿色创新的价值观、责任感，把绿色创新作为创新发展中的一个理念。社会千千万万的人具有无穷的创造力，要发起绿色社会运动，倡导每个人都做绿色的发明家。第二条是要进行知识制度的改革，保护企业创新的利益，通过环境信息的公开，万众创业，大众创新，能够保障每个人在绿色环保方面所做的创新，他的利益能够被自己所占有，这样就会出现人人创新的局面，也建议国家设立绿色创新工程和绿色科技创新奖项这样的措施。谢谢大家。

郑新立:

谢谢。老百姓对你们的期望值很高，希望你们强化环保部执法监督能力，把偷排、装了设备不使用的现象，通过你们严格执法得到杜绝，相信我们现在大气污染、水污染状况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下面请张廷克同志发言。他是中国华能集团的副总经理。

**张廷克（中国华能集团副总经理）：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

第一，我们是一个发电企业，绿色发展重点围绕电力生产怎么样能够实现绿色发展来谈一些看法，和大家交流。刚才傅总说了，这次巴黎大会总书记作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承诺，我觉得其中对能源行业最大的冲击就是2030年中国碳排放要达到峰值，并且要力争尽早实现，这绝对对中国能源行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不是个小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们的能源生产，低碳、清洁、高效发展，提出了倒计时，确定了一个目标，对能源企业来讲，尤其是能源生产企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尽管我们是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但我们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未来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话，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的能源需求还在增加。以电为例，我们到今年年底电力装机容量15亿千瓦，我们的人均装机只有1000千瓦，但是美国是4000千瓦，欧洲、日本是3000千瓦，韩国、台湾也是2千多千瓦，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我们想将来能源需求肯定要增加，尽管速度慢一点，但肯定要增加。比如到2030年，我们行业内认为电力要从现在的15亿增加到30亿，到那时候也就2000千瓦，也就是目前韩国的水平。如果到205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不说赶上美国，就是赶上日本、欧洲这些国家，人均3000千瓦的话，我们的装机容量达到50亿千瓦，除非终止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样对能源企业来讲，怎么样实现低碳，清洁发展，安全高效发展，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能源、生产、消费革命的态度来对待能源、消费的问题。需求的增加，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通过革命的办法来解决。

第三，从电力来讲，必须要大力发展低碳清洁能源，不断的提高低碳清洁能源的比重，或者通过低碳清洁能源的技术进步，既要增加能源供应，但要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到2030年之后还要减排，碳还有减排问题，怎么办？必须大力发展低碳、清洁能源。不仅仅达到20%的比例，要更高才能满足需求。怎么达到，到2030年之前我们还是有这种潜力，我们开发的水电开发了一半，现在是2亿多，到2030年我们要达到4亿还是可以的。可能开发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尤其是到西南部，到西藏、川藏、滇藏等等这些地方开发成本会高，需要国家在政策各方面支持，包括生态环境，怎么解决，这是第一。

二是要加快发展新能源，风力和太阳能，风电，尤其是太阳能，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有的说中国可以发展到几十亿，我们现在风电，包括太阳能，今年年底可以突破1.5亿，规划到2030年超过3个亿。有的说到2020年，2030年可能这两个加起来达到8个亿，风能、太阳能都超过4个亿，现在从技术来讲，已经具备了这种条件。十年前，太阳能2万多块钱一千瓦，电价2块多还亏本，但是现在太阳能的造价可以控制在8000元，电价8、9毛钱就可以保证发展，我觉得技术上应该具备了。将来怎么样给能源企业一个好的预期，怎么样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降低成本，这都需要靠技术创新来实现。

三是核电，更安全、更高效的核电技术，现在中国三代核电，包括四代核电都在示范，一旦成功，核电方面可以大规模，尤其是沿海核电大规模，这种条件中国现在每年具备了十台套，一千多万千瓦的生产能力，核电也是具备的，通过技术进步能够实现。还有一些比较低碳的，像天然气发电，也可以满足要求，通过这些技术进步，为2030年之后更进一步发展低碳创造条件。

四是怎么合理把握燃煤发电的发展节奏。清洁、高效的发展煤电，大家都觉得发展煤电落伍了，中国一次能源的70%是煤炭，发展煤碳首先是高效清洁发展，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煤耗，包括环保上，现在的电厂都可以达到燃气排放标准，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之前把现存的煤电都改造成达到燃气排放标准，我们新建的都要达到这些标准，这些标准在世界上我们是最先进的。我记得美国的能源部长当时到我们上海华能电厂去看，他觉得很震撼。

煤炭的消费要有一个总量控制，怎么样增加发电用煤，我们国家现在在煤炭里消费用在发电领域的比重大约只用了50%左右，世界发达国家达到了90%，因此怎么样能够把小火炉，现在雾霾，究竟什么原因，有汽车的问题，周边的农民取暖，烧煤，将来能不能通过替代，通过发电，高效清洁的发电，这样来减少污染物排放，重量可控制的情况下来提高。

五是怎么样开展能源消费革命。电力行业怎么样能够提高电力消费在整个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电力是清洁高效的，比如电动汽车，减少石油的消耗，比如取暖，国外都是电取暖，能不能电取暖。做饭用电，改善生活习惯，等等，包括零排放社区等等，国外都在搞，消费观念的革命。华能是个发电企业，我们大概每年投资70%都是用于低碳清洁能源，“十二五”我们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计划到2030年提高到50%左右，就是低碳清洁能源提高到50%左右。

促进低碳能源技术进步上，煤炭的高效清洁基本我们走在前面，可以说在全球，在国内起到了引领作用。另外，核电，第四代核电，固有安全的核电，我们在山东蓉城建设，包括第三代大型先进压缩机都是国家重大专项，一旦成功，将来我们的核电发展也可以迎来高峰。促进水电开发商，现在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今年已经投产的第一个大型电站藏木电站，大概有5千万—6千万千瓦，规模比较集中的深入论证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快发展，碳减排，真正发展清洁能源，开发优质资源，能源企业在这方面既是责任也是挑战。谢谢。

郑新立:

华能是我们国家重要的电力企业，他的介绍让我们看到了将来发展绿色能源好的前景。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现在国内已经有突破，国家能源局制定的2020年能源新增计划提出要推广能源煤炭的分阶分支梯级利用，把地阶煤里面的油气踢出来，剩下的清洁高效煤直接进入发电锅炉发电，可以大大减少污染物排放。通过发展非化石能源，刚才张经理讲到，风能、太阳能，现在成本降低越来越接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还有西南大量的水电资源还没有开发。还有核电，也应该提高它在能源中的比重。我们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绿色能源，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应当说是完全有这个可能的。下面李晓西教授发言。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绿色发展**

谢谢大会的邀请，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坚持到了现在。绿色发展是人类共同的追求，2015年后发展议程在9月25日纽约开会之后，定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169项具体指标，这里面17项中和绿色相关的领域包括了水、环境卫生、能源、工业、城市、气候、海洋资源、森林、荒漠等。气候大会在11月30日刚开完，这次又专门有长期目标，检查机制、透明协议、气候资金、自主贡献，对绿色发展无争议，绿色发展谁掏钱是有争议的，这个钱给谁，什么时候掏出来，这个讨论了一下。这次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两度的气温上升的控制，现在提到了1.5度也要控制，这个是很不简单的，2度的气温上升意味着有一批城市会被淹没。包括上海都会有问题，应该控制。说气候变化，但是我们怎么感觉到冷，没有变，是人的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气温上升，不是老天爷自己气候的变化，这是两回事。

中国应动气候变化行动是非常快的，总书记在大会上有一个合作共赢，关于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讲话，中美两家谈到的一些观点，使这次开会取得了很大的。大家知道美国在京都议定书上不签字，拒绝承担那么多义务，觉得现在不能承担那么多，这次两家谈了以后大家都签字，中美签字是非常重要的，中美两国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国家，现在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我们政治局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在3月24日提出绿色化，新型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这五个化什么含义？就是绿色经济的升级版，体现了绿色发展的战略性，绿色发展的紧迫性，绿色发展的实践性。

中央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4月份的文件中有个35条，其中第十条讲了很多节能环保产业，包括核电、风电、太阳能、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旅游等等，说了很多，非常重要。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发展绿色产业，比较早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的概括，一个是我们的数量约束和质量约束在资源方面是共同存在的，原来说我们地大物博，这句话很多年都听不到了。我们的石油、铁猛等等总量是不够的，人均更少，淡水资源在全世界还及全世界平均的1/3。我们的能源短缺和能源的高消耗是并存的，建国60年我国GD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40多倍，现在我们得到的这些东西和欧美，尤其和日本相比，我们花了更多的代价来得到，这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我们的发展必须要绿色。

再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治理的困难并存，我们很早就在喊要环保。我们曾经翻译了一本书是斯坦福教授搞了一个资源手册，其中日本的学者都留重人特别高度评价了中国的环境，从那以后工业化开展，我们看到污染的情况特别厉害，非常快。绿色经济对各地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高端的现代服务业，这在联合国的排名中放第一，这是比较的。高新技术，新能源清洁，还有低碳，包括打破的壁垒，这个很重要，很多产品到了国外去，有很多壁垒，现在是绿色壁垒，生产过程或者是消费使用，绿色壁垒要打破，这个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用非常大。

我们在探索中国际社会怎么衡量绿色经济，人类发展指数我不多说，绿色讲的不多，我们去年发了人类绿色发展指数，但是影响非常大，20多年了，他们用了非常简单的指标来衡量人类发展，但是现在他们提出也想加绿色。还有UNEP的包容性财富指数，涉及到设备很多环保的问题。OECD搞的美好生活指数，很多都涉及到了我们的生活、健康、环境，包括真实进步指数，要扣除环境红利，我们准备要做，和他们结合一下做真实进步指数。还有世界银行的“财富核算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价”，他们强调资本，用资本来核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还有UNEP的绿色经济指标使用指导，出了好几本书，有操作的文件。OECD绿色增长指标，他们的指标搞得到比较全。欧洲环境署有EA绿色指标，设计了各个方面的环境，还有全球绿色经济指数，是由国际咨询公司开发的，有领导力、政策、清洁技术、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等等。还有全球环境展望，这是GEO的。环境绩效指数EPI，是耶鲁大学和哥伦比大学合作搞的，专门考虑了空气质量、生物多样性、水资源等等。全球竞争力指数，是世界经济论坛搞的，这个指数也很重要，现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包括绿色生物群落，农业利用水、二氧化碳排放等等。还有国际资源小组搞的指标，生态足迹。

全世界用各种方法在衡量我们的绿色发展，怎么来发展，我们做了多年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绿色和发展要结合起来，不是生态最好的地方指数最高，我们算下来的结果，可能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地区程度会高一些，但是也不完全是。（图）这是2015年的版本，今年的版本重点是有些企业调查，从2010年做起，有两本英文版，现在国外的来越高的很多，我们希望和大家在网上共享，因为绿色不是哪一家能做起来的，我原来是搞财政金融的，我们都往这方面靠，因为小孩子都问PM2.5，我很心酸，可持续发展，经济界也介入一下，因此和夏光老师他们的团队在合作，去年作了一个绿色经营的年度报告。

我们专门请了一批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和环保方面的专家，像环保部的潘越老师，还有国合会的徐庆华老师，还有一些老师都是做经济和环境的，比如气候司司长等等。

我们设计了一些指标，经济增长的绿色度，一产、二产、三产和绿色增长，增长这么多花了多少代价，资源承载能力，资源丰富、生态指标和环境压力指标，政府支持度，政府投融资，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肯定给它的得分就高。我省一级指标中我们选了60个，我们从1500个选来，全世界，各类杂志，我们不断地淘汰哪些中国用不上，哪些中国有，有了还要可持续得到数据，我们选了60个。四川好几个地方都说我们在参考你们的东西，觉得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很好，我们去了几个地方，包括青海专门邀请我们过去谈，城市有44个指标，比如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人均氧化物排放，平均土地二氧化碳的排放，人均绿地面积等等指标。

2015年的报告我们算了30个省市，排名最好的是北京，大家会说雾霾这么重，怎么北京还排名第一，刚才聊天还说我们要有一个关键理解，这个排名是和发展结合，我们算的是2013年的北京，不是今天的。同时我们后面还要给大家PM2.5的指标到现在为止只搜集了47个城市，确实没有办法，我们想把它放进来。

再就是省内排名，大家会看到，东部地区和一些西部地区相对好一些，中部地区这方面相对弱一点，因为绿色这块不如西部，发展这块不如东部。（图）这是今年报告100个城市的发展排名，最好的是深圳、克拉玛依等等，北京排第六。排前20个的和后20个的，这是排名情况。

我们到一些城市以后，有些城市说我们为什么排名比较弱，比如我是成都人，我回去他们问我为什么排名比较差，我们把数据公开讨论，看看哪一个数据不对，还搞了一个所谓的体检表，我们把60个数据、44个数据都在后面公开，每一年数据来自什么地方，我们都用这些算的，方法是一样的方法，这样的话我们希望给各个城市一个查询的资料。PM2.5特别重要，因此我们去年就说要放进来，数字不够，今年只有47个城市的，我们这是向环保部要来的，如果我们现在每天把各个城市的监督起来，我们自己不是不能做，但是做完之后就怕认可度，包括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叫做无数列表，全世界都关注，现在各省的统计数据拿不到，曾经和他们座谈过，我觉得现在应该有。科学院做了一部分，但是不够，我们现在需要全覆盖，100个城市都要有，47个城市把PM2.5加进去做了绿色发展指数，我们没有办法，只有47个，我们希望至少做到100个，希望明年做全，统计局有很多专家，想和他们讨论一下，是否权重高一点。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做过一次发布会，有记者同志说北京不能排这么高，有的人说我从维也纳回来，说这个不行。城市绿色发展统计局作了调研，环境怎么样，绿色化怎么样，政府垃圾处理怎么样，这个调查完以后的排名情况又不一样了，像北京在这里面排名第31，而有些城市排名很前。我们把排名靠前和老百姓调查靠前搞了一个波士顿矩阵，前面有一个格，后面有一个格，四个方格来综合反映一下，这是我们做的。

今天的会议是一个非常好的会，大家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感到有很多不足，资料的不足，尤其我们水平也不足，希望在这个会上和大家有一个交流，同时希望绿色发展作为五个发展之一，将来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做，而且一定能做好。谢谢大家。

团中央未来网:

尊敬的郑理事长和台上的主讲嘉宾大家下午好，我是团中央未来网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台上的嘉宾。第一个问题请教环保部的夏光主任，刚才郑理事长多次谈到了雾霾问题，现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都面临着很严重的雾霾问题。我想请问夏主任，您如何看待各地在防霾措施执行上的不到位，以及心存侥幸，要GDP而不要环保的现象？请问环保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有打算如何去处理。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傅成玉老师，我昨天凌晨四点的时候打车从公司回家，本来是很短的一段路程，结果面临了北京最严重的雾霾，我和司机都迷路了，因为他的导航坏了，我们就在我家的周围转了很多圈，本来是40块钱的打车费我支付了80块钱。我想这是不是雾霾经济的一种表现？我的问题是有关雾霾经济的，有一些经济学者认为雾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另外一方面在某些方面可能会产生一些雾霾经济，所以想听听您的看法。谢谢。

郑新立:

你提的问题非常好，不仅代表了整个北京市老百姓的愿望，也代表了全国老百姓的愿望，很有挑战性。下面请环保部的夏主任讲一讲。

夏光:

谢谢你的问题，因为雾霾就在眼前，所以大家感受特别深。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句另外的话，咱们也得感谢雾霾频繁的来袭，它就是一个触动。如果说中央所部署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战略部署，要把它变成行动的话，它会在社会中有一个过程，而这种反复出现的雾霾实际上是加速这个过程。现在全社会都取得共识，没有人说为了其他的原因我们要放缓治理环境速度，没有人这么认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也是一个好事。但是好事是好事，我们还是要有科学的态度来正确认识它、解决它，有两个小点的问题我讲一下：

第一，对于雾霾这种具体的现象，也可能需要更加深入的细化一点认识，总体上雾霾也可以分为两个大的类型，一种类型是大面积、短时期的大的雾霾，主要的因素和气象因素有极大关系，一来了以后上百万平方公里都覆盖着，它的来源是各种工业的、交通的、生产的、生活的混在一起造成的。第二种类型的雾霾更加影响我们生活，就是局地性、常态化的城市灰霾现象，只要不刮风，在城市的上空就有一种灰色的盖子一样笼罩在你头上，这种灰霾的主要来源是来自于本地的源，就是本地产生的，外界输入的相对少一点，真正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造成困扰和长期影响的应该是第二类，就是这种常态化的，整天面对的，至于几天就过去的大雾霾，相对来讲对我们的危害还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治理的对策实际上还是要侧重于放在自己平时所产生的来源，本地的源里面其实主要的都是当地的生产活动和机动车尾气的排放。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地方都要侧重于治理自己的污染，而不能过多把原因归咎于别人。我们现在确实强调区域的联防联控，就是大家都要行动，而不是一个地方行动，包括北京也是，还是要侧重于解决本地的排放为主，至于周边的兄弟省市，他们有责任，但是他对短期的、常态化的、局地性的污染贡献没有那么大，我们担心的主要还是第二种雾霾现象。

第二，如何解决、应对。现在也有一种主流的观点，对地方的行为批评比较多，认为地方一味的追求GDP，和环保法律法规做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们了解的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还是要正确客观的对待，我们所知道的地方各级领导实际上对解决物产问题，解决民生关切是非常用心的，并非我们所说的把环保法规躲开，不执行，不是这样一种状态，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很重视本地的污染状况。

之所以还出现大量违法的，还没有解决的环境问题，主要和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缺有相当大的关系，所有国家的能力里面，我们的经济是大国，军事我们也是大国，但是在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方面是一个能力弱国。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经济总量这么大，但是我们能够执行环保法律法规的人员、装备、手段、经费都十分的困惑，越基层越困难。所以县级、乡级执行环保法律法规的能力缺口非常大，有苦说不出，各级环保部门、其他政府部门赋有执行环保法的职能，但是他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就像一个军队没枪没炮，你让他打仗，他打不下来，出现了这种情况。国家在统筹这个事情的考虑，首先是改革环保体制，由于县级执行环保法律法规的能力过于弱，而且确实受到当地的干扰，所以把省级以下的环保机构进行监测事权上收到省一级，县一级环保局要作为市一级环保部门的派驻机构，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同时国家已经安排了几十个亿建立全国的新的环境监测系统，通过这个监测系统反映真实的环境状况，而不是单靠基层来上报各种数据，解决数据虚假性问题。

再就是建立更加强大的监察体系，通过实施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办法，把真正的监察执法的责任不是单纯落实到环保部门，而是落实到各级党政领导头上，实行离任审计、终身追责的制度，体制改变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环保法律法规监督执行的能力会比过去有所提高，因为不是单纯一个部门的事情了。

总之，我们还是要看到未来的前景，解决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是过去长期以来国家采取的发展战略是靠抓住战略机遇期，把产能搞上去这个战略服从，这个大目标搞出来的，其中也包括落后产能。到了现在这个时刻，要去产能、去库存了，我们下一步就是侧重于制定更加细密的政策，用绿色环保的尺子来卡一卡，去掉一笔产能，叫做掐头去尾。掐头就是不让那些落后的东西再诞生，严格审批。去尾就是把落后的去掉，剩下的中间那一段是优质的产能，我们再把它进行认真的治理，把它绿色化，这样一个整体的战略在“十三五”规划中已经体现了，叫做三大战役，水气土三大战役，通过打这三大战役，把我们的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到一个相对对环境比较友好的方向上去，这样监督执法的要求也就不需要那么大压力了。

如果预测的话，治理雾霾这种事，预计还得10年、15年这样一个大的时间尺度才能还我们一个特别理想的、比较满意的清洁的空气。谢谢大家。

郑新立:

谢谢。请傅成玉同志回答。

傅成玉:

夏主任是搞监管的，所以他更多是从个监管的角度谈，我觉得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西就是我们以前发展方式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成本和代价。夏主任谈到治理，但是我们怎么样不发生，或者是发生小，这是我们国家要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要再因为今天让后代或者让明天付出更大的代价。

党中央料事非常早，从十六大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七大就明确节能减排，到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就这根主轴越往前发展越快，可是我们在十六大、十七大还不懂什么叫雾霾，我们只知道雾，没听说过霾，可是今天见到的霾决不是今天产生的，就是那个时候累积到今天的。我觉得咱们治理上讲源头治理，现在已经变成了末端治理，但是末端治理比不治理好，我们也希望把治理变成一种机遇，所以中央提出来的关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做成实际的让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公民都变成生活习惯，变化我们的价值追究，甚至是一种道德追求。

我们完全说政府监管不严，特别是地方政府有保护，反过来说，这个发展方式是这样的，那时候的监管不可能严到今天这种程度。很多人都说开车没有办法开，我们今天要做两件事：一是要真正把从政府到监管机构，从企业到公民，我们都要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真正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追求，甚至是道德追求，企业责任更大。当然，我们的公民今天意识到了，要督促企业，也督促我们自己，当然也督促政府，在执行和监管上要更严。二是我们今天下得功夫不要白费，要真正转变成明天发展的动力。我们既然付出代价了，我们要形成绿色经济，这是我们国家在未来国和国比的时候。如果我们走在前面，通过坏事变好事的话，希望我们下一代的子女们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期盼这个将来给我们的国民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创造更好的民生。谢谢。

郑新立:

谢谢四位同志很好的发言和对问题的回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进行供给端的结构改革。现在我们在个人消费品领域，总体上已经是过剩了，但是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供给不足，主要是清洁空气、干净的水，这都是公共产品，人人都要用、都要喝，是一种共享性的公共产品。政府应当把提供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作为供给端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的课题，希望能够在明年，在“十三五”加大力度。

夏主任刚才讲治理雾霾要15年，我看15年太慢了，争取“十三五”大见成效，只要我们政策措施到位，特别是发挥后发优势，把现有治理污染的先进技术给引过来，把设备都装上去，保证一天24小时运转。刚才夏主任讲，各个地方都管好自己的事，自己产生的污染源首先要控制住，形成合力，我相信“十三五”雾霾的天气应该能有一个大的变化，不要等到15年以后，太慢了。谢谢。

**平行论坛二：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协调发展**

**第一时段 共享发展成果**

主持人：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下午的论坛现在开始，我们论坛请了四位嘉宾，我是发改委学术委秘书长，我叫张燕生，下午的四位嘉宾，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国家食品药品总局副局长吴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人社部研究所所长金维刚，下面首先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四位嘉宾上台就坐。

今天下午的论坛是五大发展理念，就是五中全会提出来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也就是关于坚持共享发展，我们这个部分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过去35年改革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先让少数人富起来，先让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先扩大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35年过去了，新35年开始了，在新35年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三五”国家提出了坚持共享发展，并且在这个部分国家非常明确我们下一步发展将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迈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经济从先让少数人富起来现在开始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迈进的新阶段。在坚持共享发展可以看到五中全会的建议，讲了几个主题词，在五中全会讲下一步将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尤其是克强总理在今年年初两会讲了中国经济有“双引擎”，一个引擎是大家说的最多的“双创”，还有一个引擎就是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里涉及到下一步怎么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三中、四中、五中有一句话，一句是法定责任必须为，无法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下一步将用法治方式怎么公共产品的供给。另外一个主题词是下一步实施脱贫工程，在“十三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要实施脱贫攻坚的工程，今天上午我们已经听到像杨伟民副主任和宁吉喆副主任都跟我们谈到了，“十三五”期间怎么能够使我们目前按现有标准还有7000万人口能够实现脱贫。

五中全会的建议提出了，要提高教育质量，要全面深化教育的改革，要重视职业培训，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下一步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将是我们“十三五”的一项重要工作。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十三五”建议，五中全会提出来的，下一步要促进就业和创业，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十三五”期间要缩小收入差距，要朝着更公正、更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下一步将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等等。

我们在学习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时候，今天请来了四位都是国家顶尖级重量级的专家，由他们把我们刚才讲的五中全会这么多深刻而且对我们下一步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这些思想做进一步讲解。

首先，请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给我们讲扶贫攻坚方面的意见，下面有请洪主任。

**洪天云（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扶贫攻坚**

尊敬的主持人张燕生秘书长，各位领导、专家、老师，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参加今年的中国经济年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把“十三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做了全面勾勒，特别是要解决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短板问题，就是农村问题，短板中的短板问题是农村中的贫困地区。11月底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和刚刚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均对打好“十三五”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促进协调发展、共享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12月24日《光明日报》登载了今年的民生改革十大热词，第一条就是脱贫攻坚，这个词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总书记在审定方案的时候，由原来的扶贫攻坚改了一个字，全党、全国、全社会怎么动员起来用五年的时间解决好限行标准下的7000万贫困人口，打一场攻坚战，必须是脱贫的攻坚战，这说明脱贫攻坚已经形成了很好的共识，引起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广泛关注。今天有机会借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协调发展的平行论坛的平台，介绍国家“十三五”的脱贫攻坚和近期我们在贯彻落实相关情况，在此我代表国务院扶贫办向论坛的主办方，向张燕生秘书长，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朋友们都知道，总书记在2014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困，足寒伤心，民寒伤国，我们国家经过了60多年的发展，国家实力明显增强，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全面改善。但是因为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大，统一区域的不同群体的发展差异也非常大，因此强力推进脱贫攻坚，让贫困人口共享30多年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十三五”时期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重大的课题。

我们国家目前的贫困状况，我给大家简要报告几个数值。一是还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这个区域范围内和2000年确定的重点共有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国家现行标准，也就是2010年物价水平2300块钱的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贫困大多处于高寒山区，高原地区，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别大，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生活方式还非常落后，我特别有感情，也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是长时期大学毕业以后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工作，2010年到北京工作，确实这个状况非常揪心，未来的五年攻坚难度十分艰巨。

这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的短板，需要作出合理制度安排，形成有效共享机制。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要咬定目标苦干实干，齐心协力打赢“十三五”期间的攻坚战，补齐补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当前关键是要抓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精准这个精髓，进一步把贫困人口底数和建门立槛的工作搞扎实，搞准确，真正做到精准识别，进一步把治贫原因和帮扶的措施弄清楚，真正做到精准施策，进一步把帮扶责任落实到具体责任单位和具体责任人，真正做到精准帮扶，进一步把脱贫时间倒派工期的时间表落实到位，真正做到精准脱贫。

中央对“十三五”脱贫攻坚进行了全面部署，我们理了一下概括起来包括总书记的讲话，是一个目标、两个确保、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解决好关键的四个问题。一个目标就是补齐，补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两个确保就是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六个精准就是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倒库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围绕精准和解决好7000万人，要采取五个一批的工作路径，要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解决一批，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培训脱贫一批，生态保护脱贫一批，最后因为自身的条件因病特别是因残失去劳动能力的这一批，通过社会保障兜底解决对于最后一批。

四个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和如何托的问题。大政方针已定了，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关键是抓落实。2016年是实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起步之年，关键之年，全面实施精准脱贫和精准扶贫的开局之年，锁定对象，分类施策，实现“十三五”脱贫攻坚的良好开局，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地把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变成一个个的方案和行动。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最后一句是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需要做大量的细致、艰苦复杂的工作。

我们近期从国外扶贫办的角度，在扶贫系统，在沟通协调、督察检查各个方面都在全面展开，从系统本身自己在抓紧做好，也是建设好某个平台，完善好三项机制，组织好七项行动，实施好精准扶贫在全国贫困地区，特别是片区有针对性的四个方面的工程。

第一，是建设好五个方面的平台，实施扶贫精准脱贫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必要的工作条件。第一个是必须建立起国家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这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基础和前提，通过2014年整个一年的努力，全国调动了上百万人力、物力资源，把8962万贫困人口，这是2013年年底底数，统计的公报数分解到贫困地区以后再落实到具体的乡、村、户，户这一块按照两上两下的，从群众自愿申请开始最后到两公开一公示的模式拿出来，从今年7月20日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提出了要回头看，搞准确的要求，最近一段时间把数字全部搞准，进行大数据管理，建设大数据平台还有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

第二，要指导各个省建立起扶贫开发多方式、多渠道的融资平台，筹助和配置比较好的资金资源来保证我们这一项攻坚任务。目前已经在发改委的权力推动下，1000万人口的异地扶贫搬迁项目开始启动，1000万人口解决，总的6000亿资金都需要一个有效、快捷，能够迅速到位，到每家老百姓的平台，这是一个大事情。

第三，建设县级扶贫开发资金，整合管理平台。中央已经明确涉农资金用于扶贫开发攻坚这块，在县委、县政府在县的范围内进行统筹，这个统筹好和不好，责任最大在县里，必须落实。

第四，建设贫困村，扶贫脱贫的工作落实平台，除了村支两委，今年也是乡镇村支的换届年，同时全国已经派出了50万人的住村工作队，12.8万的贫困村，村村都有住村工作队，每一个村从中组部到省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已经派出了十几万人的第一书记到了贫困村的区域，这个工作平台怎么解决好，解决点对点人到户的问题。

第五，建立社会扶贫对接平台，全社会高度重视，高度关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昨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一条，：杭州最温暖的中学老师，她把一生的心血退休以后全部关爱到贫困孩子的身上。全社会需要有工作有效对接，而且是全社会公正公认的、放心的平台，所以必须要把它建立好。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建立完善三项制度，我简要说一下，这三项制度主要是建立考核机制。

大家知道，22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已经跟党中央国务院签订了责任书、责任状，立下军令状，这是不可儿戏。短短一段时间全国各地，省对市、市对县分别立军令状做这块事，考核在军令状的基础上必须有有效的，考核出干劲，考核出实事求是的，考核出具体实际情况的，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的，咱们政府主导的平台，把它做好这个机制。建立贫困退出机制，老百姓进到这个数据系统以后，怎么要有序进去，要有序出来，出来是得到扶持，是真正脱贫，真正解决基本问题。大家知道像80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42%是因病致贫，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因病的问题是不是解决好，如果因病的问题没解决好就是假脱贫。要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包括把民主、党派工商联的作用发挥起来，全国各地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特别是社会组织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发挥起来。各地方自己申报，是真脱贫还是数据脱贫，需要有一个公正、中介机关来承认它、评价它。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府主导、政府主体，这是我们国家扶贫开发这么多年以来，在世界上叫的最响、有影响力的一个经验和好的具体的模式。但是全社会怎么更好地参与进来，这方面有差距，因此这次脱贫攻坚要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央国家机关相关部门率先行动。比如国家教育部率先围绕贫困地区和7000万人口的孩子们的职业教育，在四五年的时间通过职业教育脱贫一批，推动教育扶贫行动，由卫计委牵头，包括部队医院都参与的健康扶贫行动。

农村主要解决老百姓增收的问题，四大块，一块工资性收入，一块经营性收入，一块政策性收入，国家各项补贴，一块财产性收入。农村产业发展，包括国家现行的金融制度为城市和工商业者设置的，怎么样适合农村包括贫困家庭有有效的对接机制，需要有特惠金融，在这方面开展金融扶贫行动。第四是交通扶贫行动，交通方面做了很多的贡献，做了很大的努力。第五，劳务协作对接。，我们7000多万贫困人口，有劳动能力的，愿意走出来的，在省内省外建立有效的劳动协作对接，特别是建立有身体能力智能和技能能够使用的工作平台。

中央国家带头，由国家68个央企牵头，对100个革命老区县和1万个贫困村开展的百县万村行动。由全国工商联带头，动员了全国一万多家利民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行动。实现精准扶贫工作，我们国家特别是西方、南方、西部各个地方的气候条件、环境条件，水、土、热各个方面是不一样的，怎么样做到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整村推进职业教育、扶贫小额贷款，异地扶贫搬迁、电商、旅游、帮扶购书以及贫困村创业支付带头人和龙头企业，适合哪一项各个地方推进哪一项，而且不拘泥于这一项，实事求是推动我们老百姓能够接受，能够带动、参与进来的具体行动。

女士们、先生们，打赢“十三五”的脱贫攻坚战是我们党和政府的郑重承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我衷心的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各位老师，大家积极建设，出主意，想办法，逐步形成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社会扶贫的新举动，为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补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短板，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促进共享发展而不懈的努力，谢谢大家！

主持人:

非常感谢洪主任给我们做了全面系统的下一步怎么打好脱贫攻坚战，包括讲五大平台三项制度，七大行动以及十大精准扶贫工程。我们相信在未来五年，脱贫的攻坚战打好刚才讲的这些行动、工程、制度，来五年在共享发展方面一定会取得显著的进步。下面请国家食品药品总局的吴局长发言。

**吴浈（国家食品药品总局副局长）：提高药品质量、加强食品安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非常高兴应邀来参加今天下午的会议。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所管理的东西都是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改革起来叫四品一械，四品是食品、药品、化妆品、餐饮，一械就是医疗器械。我今天下午选一个题目，讲药品，不可能每一个产品都讲，重点讲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从药品审批制度的改革方面的举措。药品不仅仅是关系到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也和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和进步都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鼓励创制新药，确保药品安全，促进公众健康，这是我们药监部门的神圣职责，同时也是医药企业和广大公众的共同愿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制药业发展非常迅猛，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药品的销售额占了全球的15%，市场份额之大，用这个比例看，大家一听便知道了。我们国家药品生产能力有多强，能够生产全世界2000多种化学原料当中的1600种，化工原料药我们自己基本上能够做到自供自给，我们生产的制剂做成各种各样的药，能做成4500多种，还有预防疾病所用的疫苗，我们国家的产能已经到了十亿计，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医药消费市场，这个地位几年前就确定下来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公众用药的需求得到了满足，药品的研发能力也明显提升，生物医药已经列入国家七大战略的新型战略性产业之一，鼓励和引导药物研发和创新，也成为从政府部门到研究机构，乃至企业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创新推动的作用也逐步显现，创新驱动的效应也逐步形成。我们国家的药品研发已经进入到仿、创结合的新的发展局面。

问题也不能忽视，一是我们国家药品生产的企业数量比较多，4800家地这些企业基本上是生成仿制药，所以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是比较严重的，同质化的竞争非常激烈。二是生产企业多，但同时又小，而且还散，这种格局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因此，低水平重复申报药品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药品积压很严重。三是创新能力有提高，但是跟国际先进水平比有差距，缺乏具有真正原始意义创新药品的上市。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也倒逼改革，改革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既是立足解决当前药品积压的迫切需要，更是着眼长远提高药品质量的治本之策，既是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医药强国的必由之路。国务院在8月份印发了《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意见》总要求就是要紧紧围绕保障公众健康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这么一个大局，以提高药品的质量为核心，以解决药品的积压为重点，以鼓励创新为导向，治标和治本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加快建立更加科学、更加高效的审评审批体系。

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一是提高药品审批标准。我们审批标准提高到什么程度呢？新药要按照国际上，也就是说要在全球性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新药。仿制药必须与原研药的标准一致，新品准的仿制药要以原研药作为参品，确保与原研药品的质量和疗效一致，对过去已上市的药品我们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一致性的评价工作。二是鼓励药品研发，11月4日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我们国内十个省进行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试点。要将药品上市的许可已经生产的许可分开，要允许药品的研发机构和研发人员申报新药，来实现科研成果在药品上市许可转让中利益获得最大，同时上市许可持有人可以去委托其他企业生产，使新产品能够迅速占领市场，这样可以有效的抑制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三是提高审评审批效率，重点是要优化审评的流程，简化审批的程序，增加审批的人力。我们要争取在明年年底之前把现在手上积压的产品基本消灭，在2018年以前我们能够完成基本药物目录当中的口服固体制剂这些产品质量和疗效评价。四是开展数据的打假，确保上市药品临床实验数据确实安全有效，针对当前数据不真实的问题，我们总局启动药物临床实验治查核查工作，打击实验数据的弄虚作假问题，确保申报资料真实可靠。

改革的措施还有很多，我想重点谈一谈开展临床实验数据的核查。因为开展临床实验数据的核查，这是我们改革药品审批制度本身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落实四个最严的具体体现，这样才能确保公众用药的安全，我们以此作为切入点，规范我们国家要临床实验，乃至整个药品研发生产和经营的行为，提高审评审批的质量和效力，推动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实现上市药品有效性、安全性、质量可控性能够接近或者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

总局前段时间开展了三次临床实验的核查，发现了药品管理当中的一些现象，比如违背临床实验的方案来开展研究，分析的方法不可靠，数据不完整，不规范等问题。也发现了注入实验药物不真实，编造数据、修改数据、瞒报数据等这些不真实，甚至弄虚作假的问题。数据不规范、不真实、不完整，这是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要区别对待，区别处理。数据造价是主观故意，严重违背职业道德，性质恶劣，是这次我们重大核查的对象，狠狠地处理。数据不完整不规范，这是技术问题、能力问题，要给企业改正重新申报的机会，来维护药品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企业新药研发的积极性。

女士们、先生们，保护公众健康，保障公众用药的可及和可获得，这是我们药品监管部门的神圣职责。当前我们国家新药研发势头非常好，国家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提高中国制造质量，开展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大环境，对于新药创制非常有利，我们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以制度创新来推动制药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使中国制造走向中高端发展之路。谢谢大家！

主持人:

非常感谢刚才吴局长给我们全面、系统、透彻地介绍了下一步药品审评审查制度改革目前的进展问题以及下一步努力的方向，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朋友们具有切身利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教授给我们演讲，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下面有请高院长。

**高培勇（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大家下午好，在共享发展的旗帜下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无疑是一个当务之急，也是重要之策。但是我想说，这件事做起来并非仅仅是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这几个字那么简单，涉及到一系列的包括理念、体制、结构、战略等等方面的重大调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当前有如下四件事是必须首先解决的：

第一，转换理念。有两件事首先应当提出来转换，其一是公款，经常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称之为公款，但是在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条件下必须把公款理解为税款，税款和公款不是一个意思。其二是人民，人民放在公共服务的理念条件下就是纳税人，我觉得纳税人就等于人民，为人民服务就等于为纳税人服务，校正了这两个理念之后其他的事情就比较好做。我们都讲，拿人钱财，予人消灾。如果认定公款就是税款，人民就是纳税人，纳税人缴纳税款干什么，为什么缴纳税款，其实就是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府为什么能够从人民那里征收到税款，也无非就是要用之于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一个重要的理念需要澄清的是，我们要为纳税人用好税款，根本标志就是看你是不是给人民，给纳税人提供了物美廉价的，物有所值的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转换问题，只有真实的回应纳税人的呼声，才能够真正做好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样一种工作。

第二，改革体制，我们现行体制是和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共享发展这样目标要求本身不相匹配的，从建国开始实行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条件下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体制上，我们是这样理解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一是以所有制划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主要是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一般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非公有制企业逐步进入到这个覆盖范围，但是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准上又是低人一等的。一方面是非全覆盖的，另一方面又是非均等化的。二是以城乡划界，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基本上主要覆盖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基本上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后来随着改革开放进展，让公共财政阳光逐步普照到广大农村，但是对农村提供的公共服务标准又是低于城市的。也是一个非全面覆盖，非均等化的问题。这样一种体制如果继续持续下去，很显然难以说在这样二元体制下实现公共服务的共享发展，这显然是不行的，体制要变。

第三，结构。在中国经济迈出新常态的条件下，很难想象让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的办法来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我觉得重要的问题在于调结构，我们的结构是展望世界各国，政府的支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基本的政府职能支出，其二经济建设性支出，三是社会福利性支出，我们的财政支出分布在三部分支出比例大体是20：40：40，20%的财政支出用于政府基本职能的履行，40%的支出用于经济建设性，40%用于福利性，这是我们的结构，和很多具有现代意义治理国家支出不大一样。比如美国支出结构是30：10：60，把30%钱花在基本政府的履行上，把10%的钱用在经济建设上，60%的钱用在社会福利性支出上，欧洲国家是20：10：70，用在政府职能上的支出是20，用在经济建设支出10，用在社会福利性支出70。转型国家，像匈牙利、捷克这些国家，是20：15：65，基本政府职能是20，经济建设支出15，社会福利性支出60%。在政府的支出总量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增长的背景条件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调整政府支出内部的结构去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这里基本的路径就是削减经济性建设支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

第四，拓展视野，我们以往把提供公共服务资金来源视野局限于财政预算，现在叫做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大家理解就是让财政拿钱搞公共服务供给，但是从今年开始，中国发生了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改革事件，新预算法开始实施，新预算法的“预算”二字和老预算法的“预算”二字有重大据别，老预算法指的就是财政预算，新预算法指的是包括财政预算还包括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资金在内的所有的政府性收支。所以，当你把眼光仅仅盯在财政预算的时候，充其量以去年为例14万亿人民币，把另外的也纳入视野，整个政府收支规模就是22万亿人民币。目前财政预算和其他非财政预算之间的比例是60—40%，要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的调配。还要把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保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统纳入到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来源范围之内，而且要让统一的理念、统一的标准加以统筹管理，至于内部的分工只是在提供公共服务项目、渠道等等方面的差别，但是根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都是我们可以用之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谢谢大家！

主持人:

非常感谢高培勇院长给我们讲的体制、结构、战略、调整的四个重要方面，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首先要转变观念，其次就是要改革制度，调整结构，拓宽视野，我们可以看到高培勇教授用新常态来谈下一步怎么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下面有请人社部研究所所长金维刚教授，给我们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金维刚（人社部研究所所长）：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下面我想就“十三五”时期如何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谈一些看法。五中全会已经就“十三五”的规划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其中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十三五”时期重点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

第一，关于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首先，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这在五中全会里已经明确提出来，要实现法定人群的全覆盖，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走向全民社保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前几年已经实现了全民医保基础上，在“十三五”时期，要在养老保险领域实现全覆盖，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去年参保率达到80%，参保人数达到8.4亿，要在“十三五”时期实现这样的目标至少纳入1亿5千多万人纳入养老保障体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全面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今年年初国务院发了文件，现在各个地方已经制定了方案，预计明年就会在全面实施，这项改革实施以后除了把在职的将近4000万人纳入进去之外，还有1500多万的退休人员。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今年7月份国务院发了关于《全面实施大病保险的意见》，到2017年要建立比较健全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并且与医疗救助相衔接，共同发挥托底的功能。继续推进城乡医保制度和管理的整合，这是中央早已经明确的，目前全国已经有八个省级地区，38个地市局地区和其他的地区已经实现了，覆盖的人数超过了2亿人，“十三五”时期将实现这项制度、政策、管理的整合和统一。促进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的协调发展，在我们国家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方面，作为第二支柱的补充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企业年金目前的发展是比较滞后的，目前企业年金的覆盖人数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人数相比只占不到7%，换句话说，93%以上的企业的职工是没有年金的。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以后，将会普遍的建立职业年金，有关改革方案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这两者之间将来会出现不平衡，补充养老保障领域出现新的两种制度所导致的问题，必须要推进这两者的协调发展。

第二，促进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为此首先要实行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目前正在制定方案，预计明年会出台方案，通过全国统筹可以打大缓解，目前部分地区存在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征缴、收不抵支的问题，同时可以增强基金的抗风险的能力，同时也能为适当的降低费率创造一定的条件。健全医疗剥虾的稳定和可持续的筹资与待遇确定的机制，目前在筹资方面，居民的筹资主要靠政府财政补助，占80%，必须要适当调整这样一种结构，同时在职工医保方面，目前个人账户这方面的资金占比过大，将来也要适当的调整这样的结构，增强统筹基金的支付能力。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前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很多地方三到五年可以翻一番，很多地方医疗保险基金开始收不抵支，甚至有一些地区历年的累计已经全部消耗殆尽，很多地方通过付费方式改革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十三五”时期需要在这方面加大力度。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中央已经明确要适时适度的降低各项社会保险的费率，今年已经降低了事业保险、工商保险的费率，总降的额度是1.7%，力度与目前企业的诉求来讲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下一步还是要想办法通过采取多种方式打组合拳，为降低企业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费率创造必要的条件。划转国有资本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除了充实作为国家战略储备的全国战略社会保障基金之外，还探讨划拨国有资本充实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第三，探索建立长期的保险制度，目前国家已经有3500多万失能、半失能的人员，这些人员的长期护理包括生活造价，已经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特别是这些家庭，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这方面的人数占比会不断增长，所以必须要通过社会来建立这样的长期护理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这方面的社会需求，这也要借鉴国际经验，通过探索建立具有社会保险性质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第四，大力发展商业人身保险，在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目前商业保险相对来讲发展还是比较滞后，商业保险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方面就我们国家来讲，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从国际经验来看，进入到这个阶段商业保险需求不断放大，可以通过政策扶持来鼓励和促进商业保险的发展，使它成为我们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以上就是我对于有关“十三五”时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看法。谢谢各位。

主持人:

非常感谢金所长做了一个非常好的PPT，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大PPT全面展开。下面开始提问。

记者: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是否明年将突破3%的红线，如果突破会不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问题？

高培勇:

具体的数字我很难回答你，我不是在财政管理层从事这项工作的，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赤字率的提升问题，提升赤字率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跨越3%，只要在今年2.3%的基础上增加哪怕0.1个百分点，也要提高赤字率。一个是阶段性，阶段性告诉我们并不是从此就永远跨越3%或2.3%这样的指标，而是在当前或“十三五”这样一个特殊发展阶段，有必要，也有可能提高到2.3%以上，或者是3%以上，并不能看出是一层不变的一个东西。

主持人:

洪主任长期都是在一线工作，2000年以后才回到北京，请问洪主任，你感觉这场脱贫攻坚战最难打的是在什么地方？

洪天云:

2010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干部交流到北京来，七八扶贫攻坚计划在贫困县做县委书记，来之前是重庆黔江区的区委书记，长期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工作，感受很深。最难的按照中央要求基层也是这样，瞄准7000万人，这7000万人具体情况千差万别，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只占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66%，其中还有34%在片区以外，而且分散到全国所有的农村、乡村，除了东部地区，西部的22个省很散，很具体，都在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在公共保证这方面都是非常差的地方，因此要做好这个事都是最难，这五年需要大家脱几层皮才能做到。

主持人:

吴局长刚才给我们讲了四个最严，要做好四个最严，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应该做什么？

吴浈: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问责、和最严的处罚，说到底这是一个制度体系。作为整个监管来讲，设计成一个最科学、最有效的监管体系，这是我们落实四个最严组好的保障。标准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提升。监管是落实法律责任，能够做到责任落地，处罚是监管里面的一项内容，最后还有一项要问责，如果监管有力叫率则，监管不利是失责甚至是渎职，这里面有个问责。现在感觉在整个药品监管治理过程当中，一方面治标，处理各种各样违法违规，一方面在鼓励创新，这里面包括制度创新，使得我们整个国家药品监管制度能够在原有基础上提升完善，能够使得这种管理不是一种被动的，而是主动积极的，自觉维护、自觉执行，违法违规者及时处理，使得整个环境秩序有序运转，这样让四个最严最好的落地和执行。

主持人:

高教授给我们调结构的时候讲了我们在转型中国家和欧美相比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们在建设性支出占40%，他们占10%，“十三五”我们要把这40降下来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高培勇:

理想当中的格局，应当把全部财政收入瞄准公共服务领域事项，而不是非公共领域事项。今天安排我讲会议主题就是公共服务，老百姓所需要的公共服务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们心中是有数的，老百姓需要建高铁就建高铁，老百姓需要治理环境就治理环境，老百姓需要食品安全治理食品和药品中不规范的事，一定要和老百姓真实需求挂钩，这才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最佳境界，这方面做得事情非常多，按照洪主任刚才讲的，实际上你讲的更多的体会是公共服务精准化的问题，贫困人口发生在农村地带，非国有制领域，只要按照城市地区标准，按照公有制公共服务标准，能够全面覆盖，无差别化了，这就是“十三五”期间深刻能够做的重要一件事，那才叫共享发展，增加公共服务。

主持人:

金所长，现在五险一金对企业社保负担占到44%左右，经过努力我们已经降了1.75%，这部分降下来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金维刚:

难点主要是目前养老保险费用过高，如果要真想把费率降下来必须要正视和解决历史债务问题，当年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候的转制问题，一个是改革前已经参加工作，改革以后进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我们事关缴费的年限，没有缴费的这部分费用按照社会保险法规定应当由财政支付。过去已经退休人员他们没有缴费，但是他们已经纳入到基金来支付他的养老金，过去没有缴费的这块，包括单位和个人的，其实对应的是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当时的企业把利润都上交给国家，职工的职工的工资也比较低，很多权益积累在国有资产中，应当是要把过去积累的国有资本适当的划拨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为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费率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二时段 促进协调发展**

主持人:

今天有四位重量级专家，我自己的体会，70分钟能够听到这么多专家这么精彩的演讲，也是我们的万幸，听了一趟非常好的课，也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听众们能够支持我们这次论坛，谢谢大家！论坛第一阶段结束！

下面我介绍一下第二阶段的嘉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副理事长聂振邦，他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工作，后来担任国家粮食局局长，对我们国家三农工作有深刻的体会和感受，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很好的建树。原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他抓过城建，对全国城镇化工作给予很多很重要的指导，河南城镇化走到今天和仇保兴这三个字分不开，特别是对我们河南省的城市规划都是他指导做的，仇部长在这方面有非常深的造诣，是专家型的领导，或者是领导型的专家，这两个位置互换的非常好，在国外大学担任教授，带博士指导工作，继续在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加强理论方面研究，今天下午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好的感受，大家欢迎。

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司长田锦尘，长期在规划司工作，我们经常和国家发改委进行衔接，特别是规划方面。虽然在西部司工作，实际上他的指导不仅仅限于西部，比如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已经不仅仅是西部的概念，今天他也拨冗参加我们下午的座谈，他是在国家发改委具体操作和指导部门工作，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发挥，让大家感到比较解渴。很多地方发展规划都是肖金城同志参与指导亲自编制的，比如我们在河南的时候，当时委托宏观院肖金城同志这样一批专家帮助我们研究编制的，现在是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研究员和国土所所长，一会他给大家讲的题目是京津冀协调发展和大城市病。

陈文玲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长期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是老智囊了，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她长期参与，现在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牵头主抓研究工作，在很多领域有很深的见底，才艺比较多，激情更多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出来，很多见地非常直率、尖锐，也非常敢于面对问题。首先请聂振邦局长讲一讲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大家鼓掌欢迎。

**聂振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副理事长）：城乡一体化发展**

这个题目对我来说不生疏，但是内容很生疏，我工作经历没有像仇部长这样搞城市建设，多少年都做这个工作，对这个事情有很深的了解，很透彻的分析，也有很独到的见解。我刚出来回来，说给一我个任务让我做一个发言，服从组织安排，我按照会议的安排和我对这方面肤浅认识和大家做学习交流，不一定对。我讲传承历史文化传统，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我们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从目前看二元结构还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和变化，城市和农村差距很大，但是农村的点上确确实实令人很羡慕，也很振奋，全国各地不要说哪几个点了，江苏的华西村、北京的窦店，很多，在农村的建设变化都很快，农村是一个点，还有乡，城市化率发展这么快，2015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6%，常住人口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但是城乡差距还很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十三五”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这个问题要得到很圆满的解决，就这方面的个人体会和认识谈点学习体会。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很多数据都可以说明问题，农民收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改善，但是二元结构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肯定近年来我国城乡建设的经验和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进一步指出，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的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战略，这也是拉动未来发展的新引擎，今后五年我们经济能不能达到6.5%以上，我们实现两个100年目标的关键。

近年来我国在构建城乡体制机制上去的重大突破，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新政，提出了关于农村集体土地三全分制的试点方案，解决了户籍的藩篱，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农民工市民化，继续破题城乡一体化工作，后者促动了农村集体产权的核心问题，赋予农民对集体产权的处置权，进而确立农民因拥有集体资产而派成其他的前来，使农民带着资产进城成为可能，在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但是城乡一体化作为一个及其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推进工作面临许多困难，从本质上看，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城乡利益再分配的一个过程，与此同时，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新农村应该是升级版的农村，而不是缩小版的城市，城镇和农村要和谐一体，各具特色，相互辉映，不能有具体反差，否则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在我国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去农村化”的做法，我们到下面看搞调研，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提一提，有的看法也不一定完全一致。农民有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北方农村，南方农村也是如此，一个小院落，前面一块菜园地后面一块，剩下是集体承包，很多生产生活和传统的习惯不好解决，这件事情反映不小，有些地方比较普遍。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出发，从我国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体制制度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总书记这一指示是指导我国城乡一体化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既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又是弘扬中央中华文化传统的指导方针，要坚决贯彻落实。在当前的国情下，城乡一体化问题关键在于农村改造现状，趁势存在比较明显的不协调和脱节的现象，城乡一体化中的乡发展带有很大滞后性，因此农村发展如何紧跟城市协调发展便成为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所在，农村建设的基础设施、居住条件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不应该与城市有过大差距。

过去大家一出去调研，或者是出访，领导在很多年以前，最少15、17年以前就说了，我们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目前这个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特别是有些边远落后的问题。上一个议题扶贫办主任也讲到了，我们西南、西北边缘地区差距很大，不仅是村镇建设的差距，而且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施差距更大。要把工业、农业、城市、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成为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使新农村既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又能记得住乡愁，同时又充满现代化的气息，成为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的乐园，还不仅仅是家园，农村也有现代化的气息。城乡一体化关系到我国城乡各级两集，涉及到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城镇和乡村，涵概了区域关系、城乡关系和城镇体系的布局，特大型城市、大型城市是否又带动中小城市与城镇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中小城市以城镇所形成的县域经济能否继续承接大城市的继续转移，县域经济能否主导、带动辐射乡村经济，使内部系列条件相互满满足的结果，总的说来，下一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立足于国情，以城市为主导，明确城乡关系，统筹协调发展。

重点工作有几条，第一，继续加大农业投入，既涉及到农业生产，也涉及到城乡一体化，也涉及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城乡一体化不可避免的面临农村人口持续的减少与城镇农产品需求的持续增加，只有实现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和资源集约化利用才能增强农业的保障能力，持续满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求。解决这些问题还要靠钱靠投资拉动，三驾马车这一驾才能发挥作用。

第二，逐步加大农村公共资源投入，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过程中，要改变以往公共资源项城市一边倒的方式，现在一到城里来，改革开放30多年，从78年算起将近38年的时间，城市变化确实很大，这些繁荣的结果既有农民兄弟的辛劳、智慧、心血，也包括农村的廉价的各种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也包括环境资源，要加大农村公共资源投入，加快弥补过去的欠帐，有针对性的解决农村公共资源缺失问题。

第三，做好村镇规划，纳入整个城乡规划，尤其是涵盖县域经济规划内，实现村镇与县区经济的统筹发展，充分发挥村镇经济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夯实县域经济的产业基础，县域经济在城乡一体化过程当中，上连大中小，指城市，下连村镇乡，如果城乡一体化县域经济没有一个明显，往下不能带动，往上不能承接，是城乡一体化的桥梁、纽带和推动者，要实现县域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提高县域经济产业技术水平、技术含量与综合竞争实力。

第五，强化五大文明的城乡统筹，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新型城乡关系要充分体现人文与生态的内涵，避免大城市通过城乡一体化对三高一低产业进行无序，有的说是恶性转移，不管怎么说，污染以后就不要把它转移到周边，现在转移到周边、转移到农村不是解决办法，风和空气是受大气环流的影响，我们都生活在北京，近一个月以来，雾霾天气就是因为我们周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不合理，高污染、高能耗也是我们必须淘汰的过剩产能，有的是落后产能，钢铁、煤炭、水泥、化工、平板玻璃等等，最后造成PM2.5过度超标，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造成环境污染，如果我们把农村反过来对我们也是影响，使村镇成为城市淘汰落后产能的垃圾框，这个做法是走不通的，确保城乡共同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美好家园，谢谢大家！

主持人:

请仇保兴部长介绍关于新城镇化的看法。

**仇保兴（住建部原副部长）：新型城镇化**

大家都知道刚刚开了30年一次的城市工作会议，很多人都问我，城市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是什么，我看了众多专家解读，每个专家的解读都不一样，因为城市工作会议内容太丰富了，我们等待了37年，把37年的话一股脑都说出来了，而且词很新很专业，要归纳总结给我10分钟确实困难，我概括为一化两性，一化就是绿色化，两性就是凝聚性和系统性。前37年开过一个城市化会议，经历了37年以后又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这两次城市工作会议间隔了中国的城镇化从起步到成熟，但是我们短短的37年，我们走过了发达国家100多年城镇化的历程，仅仅37年的青壮年，已经到了城市病非常多，未老先衰，这一次提出来城市应该是绿色化的主力军，应该从灰色化走向绿色化，我们整个中国要朝着绿色化的方向发展，生态文明发展，分成三个板块，自然的板块本来就是绿色的。自然界不去折腾，不要是大工程，不要开山辟水，不要挑战自然、征服自然，自然永远是绿色的，充满绿色智慧，人类不过300万年历史，自然界存在几十亿年，比我们聪明多了。

第二个板块是农村，如果我们不按照美国的模式改造，不是把农村搞成能源农业或者化学农业，或者是完全是机器操作的大规模的农业，那么我们的农村、农业也是绿色的，因为我们的村庄是可以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我们的农业还是地少人多、地形崎岖、物种异常丰富的农业，我们向有机农业转移，向地理这名商标的产品转移，把每一个村过去历史上的供品都挖掘出来了，我们走一条有机的，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一条绿色农业发展道路。我们的农村农业这块问题不大，也可以保持绿色，剩下的阻碍绿色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或者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尽管只有50%的人住在城市里，但是75%以上的人为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产生于城市，75%以上的能源、资源的消耗是被城市消耗的。75%的废气、废渣、废统城市产生的。要把城市弄成绿色，基本上这个绿色化就可以实现了，城市要是不能绿色，绿色化就不能实现。这次提出城市的绿色发展，也就是说从我们过去习惯于用工业推动，我们要转向绿色发展，灰色的城镇化要转向绿色的城镇化。这就提出来城市必须节能减排，抓住城市节能减排，有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一个教授说，日本在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别的事情可能没做好，但是这件事做对了，从日本城镇化后期70%以上的新增GDP是节能减排、城市矿山、循环经济这些新产业带来的，这给我们中国一个启示，我们是供给方，绿色转型包含巨大机遇。

讲到两性，第一个是凝聚性，大家不要以为给房子住就行了，早在十年前美国普利斯顿大学有一个教授，写过几本著名的著作，一本影响力最大的是全球化网络体系中的城市，提出著名的观点，在全球化时代、网络化时代所有的人都被链接起来，城市成为网络接点，但是有一部分城市会由于你有准备，把凝聚条件改善，能够争夺资源中最稀缺的是高等人才资源，这个时候城市乘势得到提升、得到壮大、得到发展，成为本国、本地区的火车头。还有一部分城市没有做好准备，结果城市病非常大，这些城市会边缘化。全球化网络时代的城市面临着要么是节点化，要么是边缘化，一个国家在表现出国际竞争力，那些能够进入节点城市的竞争力所组成的。如果我们的城市失去了凝聚，失去了对人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高级人才的吸引力，离衰退就不远了。城市衰退带来民族国家的衰退，我们已经把凝聚性应该提高到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的高度去理解。比如空气污染，比如交通拥堵，比如居住极大的不公。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凝聚性是两个极端产物，高等人才对凝聚性最有发言权，城市的幸福程度是由最低收入阶层来决定的，你这个城市凝聚不凝聚，最低收入阶层说话，他们觉得幸福就幸福，解决农民工进城待遇不高的问题。

系统性，我们国家做任何事情都是讲究系统、宏观、整体，但是带城市的问题上这么多城市病未老先病，城市的有机性、统一性被肢解了。我在有一篇文章中专门讲到，我们城市交通为什么拥堵，就是引进了高速公路的模式。我们的城市为什么遇到了严重的水危机、水污染、水短缺，因为我们引进了大江大河治理的模式，使得水不循环了，每一个城市都缺水，新加坡人均水量不到200平方米，但是把水解决了，三个水龙头，雨水收集一个，污水净化一个，海水淡化一个，马来西亚的水做成平装水返销到马来西亚。水是可以循环的，水如果不循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循环，把污水处理成纯净水，2.5元就够了，我们如果把水看成物理量用后就放弃的那就是一次，但是新加坡人就会N次，那中国人为什么不能N次呢。我们有许多问题都是用一种行业的方法解决，治了这个病产生了更多的病，城市很需要系统治理，每一个行业都要为城市整体功能提醒，为它的绿色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能把错误的模式引进城市未来。

除了横向系统以外还有纵向系统，把城市建设管理这三者走向系统起来，我们经常讲的是三分借、七分管，规划又是龙头，规划是一个过程，是从实际开始，一直到他的管理，无数次返回征求群众意见，我把规划调整成为绿色化的、凝聚的、群众满意的，在总体的空间布局合理的这种规划。它的过程性，是一种纵向系统。第三种系统是硬件和软件的系统，但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基础设施不能越集中，越大型就越好，这种观点来自于工业文明，来自于生产线，越集中，越大型的把危险因素集中了，如果我们手里的iphone手机只有一个厂家，那个公司要是出问题大家手机全闭了，但是我们有五六家，这就是一种弹性。

在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界不约而同提出来，使得城市必须有丰富的多样性，自然界正因为是丰富多彩的，是稳定的，能够抗干扰的，城市应该有丰富性，包括这些产业。我们从硬件上丰富性再叠加软件上的丰富性，我们必须有现代化的治理结构，应用互联网+ ，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走精细化、网格化的城市道路，这次专门提到了，使得我们的城市把这种经验和软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智慧城市。白智慧、空智慧、乱智慧很多，很多智慧城市建设不是围绕宜居性，不是围绕节能减排，不是围绕现代结构化治理创新，路边搞一个信息厅，如果看成是一个人，疑难病症很重，但是来了一波人，我不能看病，我只是买药的。买了药你们看着用吧，我这个药里有大数据、云计算，什么都有，很先进，，把城市病没有治，反而治出来了，还有一部分基本不懂，乱中添花，离题十万八千里，本来请一个高明的大夫，结果来了个兽医，胡乱看一看，然后打两个针，反而治出病来了。真正的治病应该是有城市的转变，首先发现你什么病，产后我用什么方法去调理，一般用西医就相当于有技术师来解决，中医用智慧城市来协调各方面的信息，帮助你基础设施提高效率，这样中西医结合才能治病，但是我们现在要把智慧城市重新调整到提供优质的公共品，而那些APP，或者互联网+延伸出来的电子商务，那只是叠加在这些公共品上面的市场经济主体能够做的事，是锦上添花的，所以说智慧城市不能忘记雪中送炭，不能忘记治病。

城乡关系应该是各具特色发展，很长一段时间错误的理解城乡关系，把城乡关系一体化变成一律化，城市里高楼大厦有的农村里比较有，城市的宽马路大广场有的农村也应该有，这就错了，我们中国文化如果用两个字归纳实际上就是阴阳，一阴一阳为之道，充满进取精神的，飞龙在天的，农村应该是厚德载物的，应该是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起乡愁的，系这种稳定的。这样一种阴阳互补的关系才能使城乡关系融合，能够得到各自长足。百年前有个英国人说过，像夫妻那样结合，在100多年前，针对英国的100多年的城镇化中间错误教训，写了一本田园城市通向明天的和平之路，城市和乡村应该像老公老婆那样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萌生出新希望、新的生机、新的活力。如果把城乡一体化理解成为一样和、一律和，那就是同性恋，一定要明白，系统的思考问题，在这四个系统上我们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我们不仅着眼于一个城市的系统，同时考虑到城市群的系统，每一个群里的城市都应该各具特色，来弥补这个群里其他城市的不足，从而在系统的规划指导下进行污染共治，生态共保，基础设施共建，支柱产业共塑，只有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才能说在系统性方面下了功夫，离最终解决城市病就不远了，谢谢大家！

**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长江经济带发展**

关于长江经济带战略，大家可能会问6300公里的长江流淌了这么多年，出了大的战略，这个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并成三大战略。我们对长江经济带这个战略到底应该怎么看。今年非常有幸国务院研究中心接受国务院委托，对长江经济带战略进行政策评估，小强主任和中心秘书长大卫，我们三个人带队到长江上中下游分别进行评估，中间也进行了很多次讨论，除此之外长江经济带在战略制定，领导同志讲话的过程我也参加了。

通过进一步评估，我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也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因为时间太紧凑，想概括一下：

第一，长江经济带形成六大联动。一是“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两大战略联动，长江经济带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大战略的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是2013年9月份、10月份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我并成“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既是“一带一路”重要的支撑，也是一个独立的战略，这两大战略的互动就是长江经济带，在国家战略中的分量比其他地方更重。

二是通过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真正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和沿线的“四沿”大的战略组合。沿海长江经济带下游，长三角，沿边在云南，中南、西南桥头堡。沿江是一个省份，沿线像沪昆高速等等，我们国家高速公路现在在长江经济带也是密度最高的，而且未来也会形成沿江的高速铁路。所以它成了这样一个立体整合。

三是东中西三大板块联动，长江经济带既有东南沿海，又有中部，湖南、湖北、江西，还有西部，像云贵川重庆，长江经济带整个发展起来了，形成了中东西这三大本板块联动发展。

四是长江经济带是发达地区和快速发展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这样的联动。通过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向快速发展地区梯度转移，形成梯度带动，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或者更大的空间。克强总理多次提出，中西部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回旋余地，从长江经济带看再清楚不过。

五是四大主体功能区的联动，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四大主体功能区在长江经济带都有，在长江经济带如何布局，如何形成分工比较明确的，边界比较清楚的四大主体功能区，按照功能区分别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整个长江流域发展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擎，成为绿色发展的屏障。

六是国内的区域布局和国际区域布局的联动。长江经济带从三个方向进行国内和国际联动布局。一是以长三角为起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可以链接欧洲、非洲和更远海上的相关国家。一个方向是在云南，云南又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云南的瑞丽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起点。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和磨憨是和老挝的边界线，中老铁路开始修，没通，刚刚论证，决定修。国内和国际两大区域形成我们国家周边次区域的布局，区域布局，形成新的周边关系，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二，长江经济带主要任务和达到的目标，我概括了四个走廊，四大集群。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形成四大走廊，长江像一条楼，要把这条龙舞起来，92年邓小平就说过上海浦东开发起来了，把上海带动起来，进而带动长三角发展，进而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长江整个流域发展的三步走。我们现在长江经济带战略正好在实施第三步的伟大构想。使长江这条龙真正摆起来，飞龙在天，如果像过去潜龙在渊，现在是飞龙在天。长江经济带特别特殊的是，一是要形成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不是一般的，就是一个内河航道，既包括内河航运，也包括上海港的国际航运，也包括高速铁路，也包括高速公路，也包括我们的航空，甚至管道运输。从缅甸的输油管道就是通过云南、贵州进入中国，也正好是在长江经济带的上游。是一个综合、立体的交通走廊。二是绿色生态走廊，长江的发展环境保护优先，使长江能够永远造福于人类，造福于我们子孙万代，绿色生态长廊是优先的，发展要服从于绿色生态走廊的建设，如果没有绿色只有黄色、灰色、白色，整个民族幸福指数就会大大下降。三是海陆双向开放的走廊，一头东向开放，一头西方开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上是东向的，我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老铁路，我们面向中亚、西亚的又是西向的，整个长江经济带承东起西，横贯南北，会成为海上和路上双向开放的走廊。四是高密度经济发展的走廊，我说的是高密度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长江水量比较大，比黄河的水量大，我曾经做过三江源调研，三江源源头长江径流量在源头只占16%，黄河站36%，因此长江是由众多支流组成一条浩荡的大江，承载力最强，目前在我们国家江河湖海里承载力最强，会成为高密度经济发展的走廊。

第三，四大集群，或者是四大群。这也是长江经济带重点建设任务，也是长江经济带独具优势。一是把长江经济带建成世界级城市群，原来美国五大河世界级城市群，我们的长江能不能成为像美国五大河这样的世界级城市群呢？我觉得完全可能，因为我们在长江经济带战略规划中，规划了三个大的城市群，以上海为龙头的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还有两个区域性的城市群，一个是黔中城市群，一个是边中城市群。长江城市群的分布错落有致，如果我们落实的好完全可以变成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的带。二是世界级别的产业集群，从长三角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现在成渝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尤其重庆去年GDP增速11%，今年也差不多10%以上，贵州GDP发展也在10%左右。这个地方产业转移在加快，而且新产业带动力非常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电脑中心，电脑生产基地，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都在重庆，世界级的产业群呼之欲出。三是世界级的港口群，现在有16个港口城市，其中有三大枢纽港，还有若干个直线港，这样一个内河的港口群和上海国际化大的，洋山港现在世界第一，吞吐量和集装箱量现在都是世界第一，这样的河海联运结合起来，铁、水、工结合起来，形成现代立体交通系统，支撑这样产业发展，形成世界级港口群是完全可能。四是长三角出现机场群，长三角已经建成大的机场，比如说云南，云南的机场比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还要大的多，印度智库的人来了以后看傻了，说这哪是中国的西部，他想着中国的西部跟他们一样穷，结果一看觉得非常震撼。我们云南的同志和印度、缅甸的朋友交流的时候，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充满信心，所以我觉得长江经济带真正成为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黄金水道，克强总理讲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增长引擎和回旋余地，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而且也在加快发展，美好的长江流域会呈现在中国人面前，也会呈现在世界面前，谢谢各位！

主持人:

下面请发改委西部司司长田锦尘同志给我们介绍。

**田锦尘（发改委西部司司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是“一带一路”，陈文玲讲的时候也讲到了，“一带一路”是2013年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来的。经过一年多的各方面共同努力，应该说“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我把成效做一个简单概括，概括为五个一，第一个是有了一套顶层设计。今年3月28日总书记在海南博鳌论坛上宣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已经制定，随后两个小时后，“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就发布了。这个愿景与行动是国家发改委会同外交部、商务部三个部门共同制定的，愿景与行动是顶层设计，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主要理念、思路，包括一些主要内容，包括一些推进的路径。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概括，大家去把握核心内容。一个核心概念，五大方向，五大重点和三大机制。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本身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涉及到各个国家交流合作，不是共建、共商、共享，不能够做到互利共赢，那这样的话战略实施非常困难，得不到社会认可，所以它的核心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也就是互利共赢。

五大方向，陆上有三大方向，主要从东亚到欧洲，通过东北、西北进中亚的方向，西亚北非。海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往欧洲去，一个是近南海转南太平洋延伸。总书记讲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进机制可以为三大机制，双边合作机制，多边合作机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展会、论坛等等这样一些机制。

“一带一路”内容非常丰富，要抓住核心，可以用“1553”这样一个归纳把重点和内容抓住。各地也都在行动，地方的一些顶层设计和实施规划也都出来了，到上个月为止，所有31各省市自治区，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制定了推进“一带一路”实施的方案，这个方案有部分省市已经正式对外公布了，上个月包括到这个月延续了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也都做了系列报道。

第二个是一系列国际共识，“一带一路”倡议出来以后刚开始有不同解读，不同理解，通过一系列、多种形式、多种方式的宣介，应该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得到沿线各个国家的认同和理解。我们通过大数据多方面做了一些分析，应该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国际媒体97%都是正面的，没有发现重大负面的评价。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有利于各个国家共同发展的共识已经逐步形成了。

第三个是一揽子的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战略提出来以后，应该说各个部门，各个地方主动与国外各个国家进行对接，签署了一系列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协议，我们与俄罗斯、蒙古签署了，三方共同编制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协议。我们还与塔吉克斯坦、匈牙利、土耳其等签署双边、多边合作协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50多个成员国也签署了协议。私募基金去年成立以来比较分立，第一单投到巴基斯坦，陆陆续续好几单投了，进展非常顺利。这些都表明一系列国际共识都转化为一系列的具体成果。

第四个是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总书记访问巴基斯坦，我们跟巴基斯坦签署460亿项目合作协议，总理在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时候，我们也签署了28个项目合作协议，涉及经验230亿美元，同时有些重大项目，特别是高铁项目相继开工，特别是雅万高铁历经波折，最后我们中方顺利中标。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大概有200家企业与沿线国家商签了合作协议和合作项目。总书记访问英国的时候有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宁波集装箱的指数在波罗的海交易所发布，这也是波罗的海交易所200多年以来首次发布机构以外的指数。

第五个是形成了一股建设的合力，现在国内从上到下，包括国外的使馆各个机构方方面面都应该行动起来，国内国外上上下下已经形成一股很好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力。我可以把这一年多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取得的一些早期收获用五个一来概括。

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完成了，省级层面中层设计已经完成，下一步更多抓好落实，推进落实，需要重点突出，重点国家、重点方向、重点领域来推进和落实一些相关合作。一是加强陆海通道的建设，可以概括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要建设六大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的经济走廊，中国东南半岛经济走廊，西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六路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包括公路、铁路、空路、水路、管路、信息路，多国多港，我们有海上方向，陆上方向，需要在这两个方向上选择一些重要的国家和港口把这个支撑起来。

二是进一步推进重大项目合作，重大项目在“一带一路”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标志性意义，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强调要加强重大项目的建设，形成一些标志性的工程。我们要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总的框架下加快推进一些重大标志性项目实施，比如高铁项目要加快推进实施，已经开工的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路线图争取尽快取得收获。没有开工具备条件的创造条件，尽快达到开工的标准尽快推进。同时为了保证“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延续性、可持续性，提前做一些储备，保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能够保持延续和可持续。

三是进一步完善好“一带一路”推进协调机制，“一带一路”涉及面非常广，是很大系统工程，国内国外上上下限，要做好统筹协调，特别是要很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更多的是要创造比较好的环境，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企业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参与竞争，要遵循所在国的一些法律法规，遵循和尊重所在国的一些风俗和习俗，特别是要注意保护环境，建设绿色丝绸之路，企业出去以后把雾霾也带出去了，这样投了很多钱，最后不一定认可你，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和国内大的战略政策做好衔接，刚才陈文玲女士讲到长江经济带的问题，跟“一带一路”也是高度重合。包括主体功能区建设，实际上跟“一带一路”也有联系，在推进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一带一路”战略与其他一些重大战略，重大政策进行衔接，避免相互矛盾，形成合力，这样才可能保证这些战略能够得到顺利推进。

进一步做好传播能力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也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他还讲到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我们怎么样扩大朋友圈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改善环境，加强传播能力建设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方面，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加强传播能力建设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中国化和国际化这样一种结合，既要体现中国的特色和中国的声音，同时又要体现国际视野和国际上的表达，把你的东西包装成国际化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接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用丰富的内容和形式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

主持人:

最后请肖金成所长讲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大城市病。

**肖金城（宏观研究院国土所所长）：京津冀协同发展**

我讲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北京大城市病治理。我就讲两个数据。北京市的地区生产总值20000多亿，第二产业是21.4%。从这个数据来看，它的第二产业有4000多亿。北京16400平方公里，但是有4000多亿的第二产业的GDP，这就知道北京为什么会人口膨胀，因为错过了大多的就业岗位。第二再看看河北，河北的第三产业是37.2%，全国是48.2%，48.2%和37.2%比，就发现河北光生产不消费，第三产业是和消费有关系的。所以从这方面就知道经济的数据存在什么问题。

（图）区域合作一般是相邻、并列的，但是发现北京和天津不是相邻和并列，而是嵌入河北之中，而且北京和天津在什么位置，我经常开玩笑说，北京是在河北和心脏位置，天津是在河北肺的位置，北京成为首都，天津成为直辖市，这个心里和肺走掉了，河北为什么发展慢呢？假如说一个人少了心脏和腓能活下来么，所以河北能活下来已经不错了。我是搞区域经济研究的，区域经济有一个理论和判断，区域靠城市来带动，城市不能自顾自的发展，自顾自的发展，区域肯定是落后的是一个欠发达的区域。一个城市自顾自的走是走不远的。所以前几年北京搞世界城市，我也参加过几次研讨会，世界城市周围的欠发展地区或者是一个贫困地区的话，世界级城市能世界到哪里去啊？

（图）这张图是一个地貌图，经济北部是燕山山脉，西部是太行山脉，这两个山脉像一个围墙，挡住了西伯利亚的寒流，挡住了内蒙古高原的风沙，同时把风给挡住了，没风那环境肯定出问题了。环境不大，那就不能什么产业都要发展。河北产业是钢铁、能源、化工、建材，四大产业无不是高耗能的产业。话又说回来，如果河北不发展这些产业，那发展什么呢？只能喝西北风，如果西北风都有河北喝了，那北京的环保问题不是更严重了，那雾霾就不是几天的问题了，那365天都是雾霾，因为没风了，风都让河北喝掉了。

我们说北京还有大城市病问题，大城市病是大家感同身受的。大城市病什么原因？我觉得就是北京创造了很多的就业岗位，这些岗位吸引了很多河北人、全国各地人，这里的服务很好，这里的就业环境很好，这里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很高，农民工说你不要给我户口也不要给我公共服务，只要不赶我走就行了，只要让我留下来我就觉得比河北好。2014年我们给北京市空间布局做过研究，当时提出五大问题，北京市中心城区功能叠加，就业与居住高度分离，中心外延拓展，卫星城建设未达到预期目标，各县乡继续发展工业。这就是我们当时2004年给北京市提的问题，那么过了10年，我发现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所以京津冀的协调发展，一定要统一推动。

2001和2011年十年时间，扩大了若干倍。形容北京的发展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中国发展像北京一样，我们早就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了。关键是大家就发展一个城市是不够的，现在我们看看大城市病治理，我提了三个对策，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一定要调整，北京不能再发展工业，要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北京的大城市病会更加严重，产业结构要调整，要壮士断臂。打造“反磁力中心”，人搬出去，人是不愿意出去的，尽管有雾霾，大家还是愿意在这里呆着，要选择一个交通更便捷、设施更完善、环境更美好、经济更繁荣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把人产业转移出去。要打造这样一些反磁力中心，不过让人们主动转移很难。发展城市群，不是一个城市来发展，过去是一个大都市、省会城市发展很快，周边城市发展不起来，大城市产业要高端化，发展现代服务业，不要什么产业都发展，留点产业给别的城市，城市群的各个城市要分工，功能要互补，只有分工才能合作。研究经济合作的时候提出来，要搞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我认为经济城市群是有条件的。

主持人:

给大家几个提问的机会，大家有问题举手。

仇保兴:

谢谢你的担心，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现在需求和库存你要看多大的需求能够释放出来，而且有多大库存能够去除，这是很关键的问题，现在库存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要大，而且这个库存坐落的地方又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北京的三环、四环之内，是在二三线城市的库存，非常严重，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鄂尔多斯，现在只有50万人口，但是可以住150万，所以说我们去库存要有一个长期、艰巨的，而且是多渠道的这么一个新的战略选择，不是很多人所想象的，把需求一上报出来房子住满了，这不可能。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是一个住房分配严重不均的时代，比如在北京，老板前几年有钱把信用卡一刷，买几十套放在那里等着升值，像北京现在的博士毕业现在没有房子，北漂估计有将近800万人没有房子，但是北京的地下室不停车住满了人，所以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住房及其不均的时代，我们还没有一些调控的手段去调节，在北欧这些国家早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一个空置税，他说很容易，三表，电表、煤气表、水表，只有平均值的5%，肯定是空置的，而且超过时间多长，我要收你的空置税，我们国家没有。我们北京这种苦乐不均的问题非常严重。农民工能消化一小部分，但是绝大部分还是要靠有稳定收入的，偏向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之间的那部分人消化，我们城市规划学中有一句名言，贫穷最低收入者没有空间、自由的选择权，也就是说打工的就住在工厂旁边，做保姆最好在主人的房子里，是用时间来换收入的，不可能像富的人一听2个小时在路上，移动性方面是非常欠缺的。我们有一个市早在十年前标榜自己怎么样关心贫困农民，盖了一个农民楼24层，到现在还空着，农民不可能住在你的楼了，跑几十公里到打工的地方，是没有空间移动性的一个群体，我们搞城市规划的人应该认识到，我们决策的人应该认识到，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

在二三线就没有希望了，也不对，二三线城市房价非常低，首先把每一个城市的反磁力做出来，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均环境的改善，很多跟反磁力有关系的，根据现在我们的调查，我们派了1000人在基层进行调查，没有中央电视台话筒对着的，完全是普通人，对居住环境影响最大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子女的教育是不是上水平，第二个是工作岗位，第三个是就业条件，按照这样的程序排下来，浙江省和上海做了这样一个决定，非常好，把你的名校、名院，一个三甲医院必须到两到三个县城镇承包一两个学校或医院，把它改造成校、分院，一年之内它的水平就提高了。所以现在上海周边60个镇，脑手术和心脏手术不需要进手术室，所以水平一定很高，最好的医生必须有1/3的时间，到那个地方去上班，整个公共资源扁平化了，而且把而三线城市的人均环境反磁力提升了，这一提升以后医院、学校、其他的服务业，包括我们实验都开始慢慢转移，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这就想到，所有的房子不是一般的商品，是有自然垄断性的产品，地理空间垄断性的产品。

北京的房子不等于呼和浩特的房子，完全是两码事。当年我在杭州当市长是1999年，那时候的上海市长，他是杭州人，他跟我讲，你在我老家当市长，我们现在要搞磁悬浮，把杭州一连起来，45分钟就到了，那个时候把德国的磁悬浮延续过去，那个时候杭州都到上海来上班，杭州变成空城了，我说您放心，我们早有对策了，很简单，我其他不好和上海PK，我四个方面准备好了，居住条件超过上海，我们旅游的环境山水资源、文化资源做足、做好超过上海，大学生、在校生在杭州我们有一个十年计划超过100万，结果达到了，那时候还只有13万人，第四个是创业在杭州，我们当时搞了15个孵化器，马云在北京都经不起诱惑跑回到杭州来，创业成功了，当时我们把软件业金融、网络经济、特别是金融软件站群众的65%。这样一来在这四个方面，跟上海有一个PK，上海跟杭州之间人才、高等的设计要素是相互流动的。

刚才讲到京津冀，京津冀和长三角相比，京津冀是北京、天津这两个巨头，河北省有哪几个城市能产生反磁力，它产生不了什么。长三角有嘉兴、绍兴都是非常美丽、非常好的城市。所以它的二级城市有足够的反磁力，它把上海的很多产业互相之间拉来，为了这个税收，但是江浙企业都在PK。我们也盯着上海的那些高科技人才，把他拉到浙江来，这互相弄来弄去，但是成功了。

河北的城市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搞钢铁，其实我们只能搞钢铁，只能搞水泥，只能搞化工，但我们曾经也搞过高科技，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有反磁力，你才能解决库存问题，哪个城市没有反磁力，你的挤压的库存现在最高的已经到50多个了，你怎么解决呢。所以，解决住房、库存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棋盘中间的一招，是要必须从城市的病治理，而且把它放到城市群里边，系统的增强那些非中心城市的反磁力，才能最终解决房地产的去库存问题。谢谢！

提问:

问一下聂部长，城乡一体化或者新型城镇化这个概念是不是一致的，新型城镇化有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住房，人均条件，人口的城镇化率加上刚才仇部长说绿色，这是几个指标组成的，权重是什么，将来怎么验收新型城镇化，有没有顶层设计？

仇保兴:

城乡一体化是我们今后随着城市化发展过程必须要走过的一条道路，如果我们国家还是大量人口沉淀在第一产业上，必须要把一部分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从事二三产业来发展，二三产业主要在城市有城市效应，今年城市化率按常住人口算是56%，我们目标是70%左右，这个当中让农村人口到城市生活、居住、工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解决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农村还是过去那个农村，城市大家都集中在一起，大城市病，很多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物价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城市的发展恐怕也是畸形的发展。农村还是过去的农村，道路、住房、交通都很落后，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我的理解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消除这些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供应上的，保证设施上的差别，这样实现城乡一体化，在城镇化过程当中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

提问:

请教肖所长，关于京津冀方面的问题，刚才肖所长对京津至于河北的关系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比喻，比喻成河北省的心和肺。还有一个比喻，就是北京市是高富帅，天津市是白富美，河北是围着一圈的小屌丝。改变京津冀过去的局面，也就是改变过去在京津冀地区高富帅、白富美独舞，屌丝旁观的格局，因此有了中央的经济型发展的规划，可以作为一个视为父母之命。在有了国家规划父母知命媒妁之言的推动下，如何使京津冀地区迫于行政命令的联姻走向真正发自内心，自发自觉长久的婚姻，强扭的瓜不甜，婚姻要长久必须要发自内心。

肖金城:

事实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我认为已经到了大家都有需求的阶段，河北早就有需求，河北很早就有需求，雾霾对北京来讲不仅是国际形象，也是北京的老百姓难以忍受的，北京市一定要把产业向外转移，不转移北京人自己也受不了。天津的产业一定是高端化，也不能搞通吃，什么产业都要发展，产业链条要向河北。我觉得这三者都有压力，压力会转化为动力，动力就会把这三者做在一起，不仅仅是父母之命，不仅仅是中央的文件压制，让北京拼命的疏解，天津产业链那么长，而是有需求，有动力，我们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协同发展纲要，未来要在机制上多下功夫，建立一个合作机制，这也是我们长时间研究的。不能把三个合并起来，合并是不可取的，只能是合作，要建立一个合作机制。

提问:

对“一带一路”战略我是非常看好的，怎么回收资金，怎么样长期保持中国的利益？

田锦尘:

您刚才问的新型城镇化顶层设计这个有，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布，发改委牵头做。“一带一路”比较复杂，和国内投资的项目不太一样，投资大的走向主要和周边中亚这些国家，很多国家政局，包括经济、社会环境都不是特别稳定，所以在投资方面一个是期限长，会比在国内投资面临的风险大一些。投资过程中更多的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更多的是牵线搭桥，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具体投资由企业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评估，来测算自己的回收期限，测算自己的收益成本。如果双方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这样的项目才能向前推进，才能够最后真正落地。现在我们在推进项目建设过程当中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谈的过程中大家意愿都是能够形成共识，但是具体到资金怎么落实的时候确实碰到很多问题，也是我们下一步推进建设过程中需要很好研究和解决的。

主持人:

今天会议从会场的氛围到大家提问，从这几位嘉宾，对每一位同志提问的认真回答，就看今天的论坛非常成功，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